

分类号: C92

密 级: _____

单位代码: 10335

学 号: 21101139

浙江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中文论文题目: 浙江省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浙江数
据的观察

英文论文题目: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Observation
based on the third national survey of women's social status

作者姓名: 刘文

指导教师: 周丽萍

学科(专业): 人口学

所在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提交日期 2013 年 6 月

浙江省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第
三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浙江数据的观察



论文作者签名: 刘文

指导教师签名: 周华平

论文评阅人 1: _____

评阅人 2: _____

评阅人 3: _____

评阅人 4: _____

评阅人 5: _____

答辩委员会主席: 原华荣

委员 1: 秦均平

委员 2: 班茂盛

委员 3: _____

委员 4: _____

委员 5: _____

答辩日期: 2013年5月31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 浙江大学 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刘文 签字日期：2013 年 6 月 3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 浙江大学 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 浙江大学 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刘文

导师签名：周文

签字日期：2013 年 6 月 3 日

签字日期：2013 年 6 月 3 日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

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致谢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两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即将结束，回首在浙大两年的时光，期间的艰辛和喜悦萦绕在脑海，虽然短暂，却是我人生弥足珍贵的回忆。值此论文完成之际，谨向所有给予我帮助和指导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周丽萍教授。论文从选题、资料收集、到修改、定稿无不渗透着导师的心血和汗水，没有导师的帮助和指导，我的论文不会如此顺利的完成。两年来，周老师以她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风范、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让我受益匪浅。值此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之际，我谨向导师给予的热情关怀和无私帮助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

其次，感谢这两年中所有教导过我的老师们。感谢浙江大学人口所的尹文耀教授、原华荣教授、姚引妹副教授、班茂盛副教授、李芬老师、张海勇老师、姚乃英老师等。正是由于你们的谆谆教导和无私帮助，我才能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业的学习。

最后，感谢我的同学和朋友们。感谢黄英华师姐、刘雪萍师姐、陈华师姐在学习和生活上的指导和帮助。感谢两年来朝夕相处的好友颜佳伟、陈玲，谢谢两年来你们的陪伴，让我的研究生生活充满欢乐、丰富多彩。

此外，特别感谢父母家人对我一如既往的支持与默默付出。

刘文

2013年5月于浙大玉泉

摘要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壮大,从最开始的几百万人,发展到现在的 2.36 亿人,可见发展速度之快。浙江省是流动人口的吸纳大省,而且是吸纳外来人口大省。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到 2012 年为止,浙江省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 2400 多万,并且预计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可见浙江省的流动人口规模之大。

本文采用浙江省六普数据和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运用 SPSS.20 统计软件做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别分析了浙江省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及生活现状,以及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方法有描述性分析,双变量交叉分析和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并且分为总体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和女性流动人口,构建了 3 个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探索各流动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状况及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性和同质性。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流动人口与生活满意度相结合,根据回归结果,影响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评价的因素有三个:收入水平满意度、劳动强度满意度和家庭地位满意度。其中男性流动人口和女性流动人口之间存在差异性,并且男性和女性分别与总体也存在差异性。

关键词:浙江;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ixth census data and a third of women in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survey data about Zhejiang Province is used to do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with the SPSS.20 statistical software . Analyz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living situation ,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 Statistical tools used in the paper are descriptive analysis, bivariate cross analysis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 And divided into the overall liquidity population, men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among female migrants to construct thre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obile groups and related fa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homogeneity.

The innovation of this study lies i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 According to the regression results, there are three factors affecti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life satisfaction, they are income levels, labor intensity, and family status ,where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the men and women respectively in the overall differences.

Keywords: Zhejiang, floating population, life satisfac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目次

致谢.....	I
摘要.....	II
Abstract.....	III
目次.....	IV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目的.....	3
1.2 研究思路及方法.....	4
1.2.1 研究思路.....	4
1.2.2 研究方法.....	4
1.3 数据来源和研究对象.....	5
1.4 篇章结构及研究新意.....	6
2 研究基础及理论框架.....	7
2.1 已有研究综述.....	7
2.1.1 流动人口生活状况的研究.....	7
2.1.2 关于女性流动人口的研究.....	8
2.1.3 生活满意度评价体系的研究.....	8
2.1.4 国外关于流动人口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	10
2.2 文献研究的评述.....	11
2.3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12
2.3.1 相关理论.....	12
2.3.2 生活满意度评价框架的理论假设.....	15
2.3.3 指标选择与解释.....	16
3 浙江省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及生活满意度.....	19
3.1 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	19
3.1.1 规模.....	19
3.1.2 年龄构成.....	20
3.1.3 受教育程度.....	21
3.1.4 职业构成.....	22
3.1.5 外出原因.....	23
3.2 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双变量交叉列表分析.....	24
3.2.1 生活满意度描述性分析.....	25
3.2.2 人口因素与生活满意度.....	26
3.2.3 社会因素与生活满意度.....	31
3.2.4 经济因素与生活满意度.....	33
3.2.5 工作因素与生活满意度.....	36
3.3 本章小结.....	37
4 浙江省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39
4.1 计量模型.....	39

4.2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40
4.2.1 Logistic 回归分析	40
4.2.3 比较分析	43
4.2.4 结果解释	44
4.3 本章小结	46
5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47
5.1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47
5.1.1 流动人口的基本特点	47
5.1.2 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47
5.2 政策与建议	48
5.3 本文的不足之处及今后的研究展望	49
5.3.1 本文研究的缺憾和不足之处	49
5.3.2 本文今后的研究展望	50
参考文献	52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1.1.1 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大批农村年轻人流向城市和工业发达的地区的现象，即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一现象，并且流动人口的规模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根据调查资料数据显示，八十年代的流动人口只有几百万人，而九十年代发展到了几千万人，根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九千万；2009 年全国流动人口为 2.11 亿，占总人口的 15.8%；2010 年全国流动人口数为 2.21 亿，占总人口的 16.5%，比上年上升 0.7 个百分点；2011 年为 2.3 亿，占总人口的 17.1%，截至 2012 年底，我国人口总数达到 13.54 亿，而流动人口总数达到 2.36 亿，占总人口的 17.4%，可见十几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发展之快。近几年流动人口发展状况如表 1.1 所示：

表 1.1 2009-2012 年流动人口的发展状况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2009 年
流动人口数（亿）	2.36	2.3	2.21	2.11
当年总人口（亿）	13.54	13.47	13.41	13.35
百分比%	17.4	17.1	16.5	15.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流动人口的流动趋势是向沿海、沿江等经济发达地区聚集，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在跨省流动人口中，从流出地来看，主要流出地是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和湖北六省，从这六省市流出去的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总数的 59.3%，数据分布分别是：从四川流出去的占 16.4%，安徽占 10.2%，湖南占 10.2%，江西占 8.7%，河南占 7.2%，湖北占 6.6%。从流入地来看，主要流入地是广东、

浙江、上海、江苏、北京和福建六省，这六省市吸纳的流动人口总数占全国跨上流动人口总数的 68.5%，分别为：流动广东的占 35.5%，浙江为 8.7%，上海为 7.4%，江苏为 6%，北京为 5.8%，福建为 5.1%。如表 1.2 和表 1.3 所示：

表 1.2 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出地分布

	四川	安徽	湖南	江西	河南	湖北	合计
百分比%	16.4	10.2	10.2	8.7	7.2	6.6	59.3

表 1.3 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

	广东	浙江	上海	江苏	北京	福建	合计
百分比%	35.5	8.7	7.4	6	5.8	5.1	68.5

由上表 1.3 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可知，浙江省是吸纳流动人口的六大省分之一，并且位居第二。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浙江流出口多于流入人口，人口处于净流出状态。进入 90 年代以后，随着浙江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民营经济的快速增长、专业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浙江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在流出口继续增加的同时，流入人口的增长速度更快，逐步扭转了浙江流出口多于流入人口的格局，称为人口净流入大省。2010 年，省外流入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的 21.7%，与 2000 年相比较，增加了 813 万人，增幅高达 220.6%，占常住人口的比重提高了 13.8 个百分点，省外人口的快速流入成为我省人口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人口流动的模式也逐渐由最开始的单人流动，变成双人流动，再形成家庭模式的举家流动。人口的大幅度增长，特别是伴随着外来人口的大批量涌入，带了一系列的社会管理问题。

表 1.4 近 10 年浙江省人口流动的基本情况

地 区	户籍人口	外来人口				
		小计	本省		外省	
	万人	万人	万人	百分比	万人	百分比
2000	4501.72	859.87	490.98	50.10	368.89	49.90
2010	4733.15	1990.09	807.69	40.59	1182.40	59.41

注：本表数据来源为浙江省五普和六普统计数据。

并且在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中,女性人口也占了相当大一部分。然而流动女性人口的生存现状却很不乐观,女性本来就相对于男性来说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而且流动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导致她们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基本上等同于廉价体力劳动者,意味着这部分人群的收入普遍较差,生活各方面条件都不容乐观。所以本研究还将着眼于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的对比分析。

1.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目的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发现,截至2010年为止,浙江省流动人口总数达到1850.28万人(其中流出人口284.22万,流入人口1566.06万),占当年全国流动人口总数的8.4%,足以证明浙江是一个人口流动大省,而且是吸纳外来人口大省。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到2012年为止,浙江省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2400多万,两年间流动人口(主要是外来人口)就增加了九百多万人,可见增长速度之快,并且预计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可见浙江省的流动人口规模之大,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对这部分人群进行有效社会管理的问题,如何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不得不引发社会思考。

再分性别统计全省流动人口发现,浙江省全部流动人口中,其中女性人口有829.76万,占总流动人口的44.84%,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不再是男性。随着大量女性人口加入流动人口大军,社会对这部分特殊人群也产生了关注。而妇女在社会中相对于男性而言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对于这一庞大的流动女性群体,她们的生存状况如何?在外出期间,她们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工作?与男性相比,她们从事的工作收入状况如何?她们是否享受社会养老保障?是否对工作环境感到满意?她们是否对外出期间的生活和工作感到满意?她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与男性流动人口是否有差异?

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所以本文将对以上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和研究。并且以第三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问卷浙江省的数据为来源,从中提取有关信息,着重关注其中流动人口的生活各方面的状况,并进行研究分析,目的是了解浙江省内流动人口,特别是男性流动人口和女性流动人口各自的生存现状,分析这些特殊人群在浙江省的生活满意度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整理和生活满意度的评估,真实反映出在浙江省内流动人

口的生活现状,引起社会关注这一类特殊群体,并制定相应政策,实施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可以切实提高这类人群的生活质量,使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更好地相融合,共同为经济建设做出各自的贡献,另一方面还可以为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提供参考意义和科学依据,也是实现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1.2 研究思路及方法

1.2.1 研究思路

本研究从人口学视角,引入社会性别意识,依据人口迁移流动的基本原理和生活质量等相关理论,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第三次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浙江省数据等资料,分析流动人口的流动状态及特征、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及其生活满意度评价,运用描述性分析,双变量交叉分析、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并对如何改善流动人口的工作生活状况、提高其生活满意度进行思考和提出建议。

首先,大量阅读相关文献,文献阅读类型主要分为三大方向: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以及生活满意度的评价体系。熟悉了解目前国内关于这三大方面的研究现状并对其作出评述,为本文的写作做好重要的前期准备,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次,仔细研读调查问卷,提取有用信息,并对有用信息进行初步统计,选定合适的指标体系,以便于接下来用 SPSS 进行回归分析。

再次,着重研究生活满意度的各种评估方法,确定最适合本研究的评估变量,然后根据妇女地位调查问卷,找出生活满意度的可能影响因素,利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交叉分析和回归分析。

最后,根据 SPSS 统计软件得出的结果,进一步分析其特点,并根据其特点和结果找出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和对策。

1.2.2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通过文献资料的选读,了解目前有关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的

研究现状以及主要的研究成果。在对文献研究整理过程中发现还没有涉及的地方以及存在的不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并建立一套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理论框架,描述浙江省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运用人口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综合分析浙江省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致力于研究如何改善浙江省流动人口生活现状,和提高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

实证研究。在对流动人口各方面的生活情况作定性分析的基础之上,为了保证研究准确性,采用了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第三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利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运用双变量交叉表分析、描述性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找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1.3 数据来源和研究对象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是: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和 2010 年第三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浙江地区的数据。2010 年六普数据主要是用来对浙江省流动人口的流动特点进行分析(本文的第三章第一节);2010 年的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则是用来构建模型,分析浙江省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和影响因素(本文第三章第二节和第四章的内容)。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浙江省的流动人口。更准确定义是浙江省的流入人口,既包括省内跨地流动人口,也包括从省外流入到浙江省的外来人口。在第四章中实证分析的观察样本,是 2010 年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浙江样本中,居住在调查地半年以上而户口在外地的常住人口(包括省内流入和省外流入),样本量为 409 个,其中男性 230 人,女性 179 人。

2010 年第三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问卷有个人调查主卷和受流动影响人员附卷两个部分。调查对象为 18-64 周岁的男女两性中国公民,其中个人调查主卷的调查内容有个人基本情况、健康、教育、经济、社会保障、政治、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法律权益和认识、性别观念和态度 10 个方面。附卷调查内容包括受流动影响人口的外出时间、收入、工作、情感、家庭等方面。

1.4 篇章结构及研究新意

篇章结构。本文的篇章思路沿着：提出问题——构建理论框架——流动人口生活现状的描述性分析——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模型分析——影响因素解释——得出结论和启示，这一研究思路展开的，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介绍本文研究问题的背景和目的，阐述研究思路和方法；介绍本文所用数据的来源，交代清楚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新意；

第二章：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介绍国内外该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相关理论进行整合，构建本文的理论框架，为本文的理论假设提供依据；并对所选变量进行解释；

第三章：对浙江省流动人口的描述性分析，从流动人口的规模、年龄构成、文化程度、职业构成和流动原因这五个方面介绍人口流动特点，运用双变量交叉分析方法，重点分析流动人口的生活现状，分别从人口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工作因素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四章：实证分析。在前两章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三个 Logistic 回归模型，先总体，再分别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进行回归，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

第五章：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根据前文的研究结果，得出结论和启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总结分析本文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将来的研究展望。

研究新意。本文的研究新意在于将流动人口与生活满意度相结合，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这一计量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且分别研究了总体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女性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两性比较分析，并分析三者之间的差异性和同质性。

2 研究基础及理论框架

2.1 已有研究综述

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将从四个方面来对本选题的研究现状进行概述: 分别是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 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活现状, 有关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方法, 以及国外流动人口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

2.1.1 流动人口生活状况的研究

有关流动人口的生活现状问题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模式是: 先描述流动人口的生活现状, 再指出流动人口生活状况存在的问题, 最后对如何提高流动人口生活水平提出意见和对策。

朱利民(2011)认为流动人口的生活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流入地与流出地资源配置不合理, 第二,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难。第三, 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率高第四, 流动人口管理无序、不清、差别化。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是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思想观念滞后, 理念、体制与机制错位, 政府对人口流动缺乏有效的导向等。该学者还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 要实现五个转变: 对流动人口的理念应该从“管理”向“服务转变”, 从“单一手段”向“综合并用”转变, 总“结果管理”向“过程管理”转变, 从“被动接受管理”向“主动参与管理”转变。杨晓东和张喜才(2011)研究得出北京对于流动人口管理存在较大挑战, 因为北京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数量每年保持较大水平的增长, 而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政策较为缺乏, 并且北京周边很多城乡结合部的环境状况持续恶化, 污染严重, 流动人口的生活环境卫生状况欠佳, 医疗卫生保障亟待完善, 尤其是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存在管理上的漏洞。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普遍较差, 住平房的人数比率最多, 达到 44.9%, 住地下室和工棚的分别为 21.1 和 7.7%, 住房里设施齐全的比较少, 其中 60%以上的住房没有厨房、煤气、电话、洗浴设施。并且流动人口的工作类型单一, 只做过一种工作的人数最多, 其次是做过两种和三

种的人数较多,而且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较长(方晓义,蔺秀云,林丹华,刘杨,2007)。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低下,对城市社会感情复杂,表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外地人采取歧视性态度,甚至某些政府部门,对流动人口也不能以平常心看待流动人口,如同一所学校,流动人口子女比有户口的本地人多交一大笔费用,并且流动人口的闲暇时间极少,精神生活穷匮。可以看出务工流动人口的工作强度大,社会地位低,精神生活极为单调(丘银英,沈建斌,2002)。

2.1.2 关于女性流动人口的研究

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1982年至今,全国女性流动人口规模一直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女性流动人口仅358万人,到2005年,女性流动人口规模达到7385万人。20余年间,全国女性流动人口增长了19.92倍,年均增长13.9%。与男性相比,女性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更为年轻,年龄结构的集中程度更高,2005年中国女性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主要集中在15-45岁之间(段成荣,张斐,卢雪和,2009)。女性流动人口婚姻与本地居民对比,有配偶、丧偶、离婚的比例更低;考察流动人口婚姻状态的性别差异,女性未婚和离婚的比例低于男性(黄润龙,杨来胜,潘金洪,尹勤,2000)。流动女性在就业中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身份的边缘化,因为流动女性结婚或生育后真正能够在城市中生活下去的极少,她们在城市人眼中是农村人,而在农村人眼中早已经变成了城市人,所以流动女性成为了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人。流动女性普遍教育程度不高,缺乏相应的城市职业技能,束缚了自身的发展,难以谋求更高层次的职位。职业稳定性差,经常变换工作;比男性流动人口家庭责任感更强;女性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以后,强烈感受城乡之间的差异,她们学习知识、技术的愿望更加强烈(王俊秋,2009)。女性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较低,没有随着职业的变动而变化,并且职位变动后经济地位的变化不大,近年来,女性流动人口的家庭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其经济地位仍受制于男性(李晓静,姜山,任秀杰,2009)。

2.1.3 生活满意度评价体系的研究

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

做出的主观评价,是衡量某一个社会人们生活的重要参数,是个体对自己生活的综合判断,作为认知因素,它影响着个体的情绪体验,从而影响到个体生活目标的定位和行为追求的取向,对个体乃至社会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是个人对家庭、工作、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指标的主观评价,心理学上对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比较多,常用的评价方法是生活满意量表和生活满意度指数。

经济学或人口学的大部分学者对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的时候,采用的是计量模型,选取若干指标对研究对象的各方面状况进行调查问卷采访,收集数据,建立模型。历飞飞和吴晶晶(2012)对“空巢期”中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采用的方法是生活满意度指数(LSI)量表对随即抽取的对象进行测试,该量表选取的指标有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子女所取得的成就、城市和乡村、是否独生子女、经济状况、婚姻状况、本身的健康状况等,根据得分水平来评价这部分人群的生活满意度状况。得出的结论是空巢期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大部分处于中等水平以上。刘冬莹(2003)研究的是知识分子身心健康及职业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相互关系,采用的方法是问卷调查,包括自编量表和中国心身健康量表(CPSHS),这些量表选取了职业满意度、工作应激、生活满意度、生活压力、心理因子和躯体因子等六个与之相关的变量作为研究因素,运用相关分析和信度检验等统计分析手段,来评价知识分子的职业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根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分子各躯体因子与常模间差别无显著性意义,而各心理因子与常模间差别有非常显著性意义。阳晓梅和郑玉萍(2009)采用两份量表: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SLSS)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来对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包括友谊、家庭、学校、环境、学业和自由满意度等六个分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包含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其他等6种因子。并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青少年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进行评价研究。该研究显示,青少年在校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整体评价是比较高的,尤其在家庭满意度方面的分较高,而学校满意度较低。金岭(2011)以究上海市老年人口为研究对象,以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在2003年和2008年开展的两次关于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的问卷调查为数据来源,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上海市老年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选取的指标有性别、年龄、户口特征、文化程度、有无

配偶、现有子女数、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是否参加各种志愿服务活动、是否在生活上绑住子女做事、经济状况自评、月收入水平、健康状况自评、患病数量、是否有兴趣爱好、是否参加社区活动、是否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与家人的关系、与邻居的关系等 18 个变量,得出的结论是,老年人对生活的主观感受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方面,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是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个人特征如性别、是否有配偶、及其子女数等并未成为老年人选择生活满意的依据,老年人在文化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感受以及个人从事的相关活动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选择密切相关。

2.1.4 国外关于流动人口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

国外的人口迁移研究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这两个层次,对人口迁移的动因、人口迁移的过程和人口迁移的后果进行研究。关于人口迁移的动因,社会学家提出压力模型,以行为主义作为出发点,认为迁移者对当前居住环境感知的“压力”或者“不满意”引起的行为。基于这一观点,Wolpert 提出了地方效用(place utility)观点和压力门槛(stress threshold)假说,Speare 提出了居住满意度模型。而经济学家则提出了住宅消费失衡模型。经济学家认为迁移被视为家庭调整住宅消费的过程,因此迁居于住宅需求的改变和住宅消费不均衡有直接关系,以此观点为基础,Brummell 提出了居住迁移模型,Hanushek 和 Quigley 提出了以成本效益为基础的模式。

关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学者 Simon Appleton (2008) 研究了中国城市生活满意度的组成和决定因素,该研究以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为数据来源,随机选取了 7000 人作为观测样本,这些调查对象来自于中国 12 个省的 71 个城市的居民,采用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包括了失业、收入、婚姻、性别、健康、年龄和政治参与度作为衡量指标,运用相关分析的统计方法,得出各变量的相关系数,来研究中国城市居民的整体生活满意度。最后得出结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生活满意度更低,并且自 1995 年来整体上出现了下降趋势,并且“非常满意”的比例低于国际标准。瑞典隆德大学的亨里克·埃克斯特罗姆(2011)研究的是老年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该研究是一个连续的以纵向人口为基础的队列研究,选取了五个城市的 681 个人作为研究样本,包括两个年龄组:

80 岁组和 90 岁组。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采用的是 Neugartens 生活质量量表 (LSI-A) (Neugarten 等, 1961) 对老年人口进行了评估。评价指标包括五个组成部分: 热情与冷漠, 分辨率和毅力, 需要实现的目标之间的一致性, 积极的自我概念和情绪基调。

2.2 文献研究的评述

关于流动人口的问题, 国内许多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 有的学者将流动人口与社会管理问题相结合, 流动性的社会管理问题是一个比较大也比较宽泛的研究课题, 属于宏观层面的研究, 目前国内的研究现状主要是集中在流动人口的生活现状这一比较微观的问题上, 而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这一总体层面的研究相对于流动人口生活现状方面的研究来说, 就比较少了。通过阅读以往学者的研究文献, 目前国内学者对流动人口的生活现状的研究大多数是定性研究, 从不同方面对流动人口各方面的生活处境进行描述性分析和总结, 而缺乏具体的定量分析。

随着女性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壮大, 这一特殊群体也引发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目前国内学者对女性流动人口的研究热点, 主要集中于分析女性流动期间的工作状况, 社会地位, 经济水平等方面, 缺乏对女性流动人口进行全面的生活满意度评价, 把社会性别与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献目前还非常少, 但是, 对于社会性别和其他社会问题的相关研究就很多了。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杨慧通过利用 2009 年中国流动人口问题调查资料, 在社会性别视角下展示了男女两性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状况与差异, 探究了社会保险参保率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 提出了提高女性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程度、缩小两性差距、促进男女公平享有社会保障权益的政策建议 (杨慧, 2010)。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发现, 时下关于生活满意度方面的社会研究非常多, 但是将流动人口与生活满意度评价相结合的研究, 几乎没有相关文献可查, 特别是将男性流动人口和女性流动人口的结合起来, 对两者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尚属空白。

通过对流动人口生活现状、女性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评价体系以及国外关于流动人口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这四个方面进行综述研究之后, 发现缺乏对流动

人口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所以本文将学习国内外学者科学的生活满意度评价方法,将流动人口与生活满意度相结合,研究其影响因素。

2.3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2.3.1 相关理论

(1) 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基本原理

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人口迁移是指:“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理流动或者空间流动 (spatial mobility), 这种流动通常会涉及到永久性居住地 (permanent residence) 由迁出地 (place of origin, place of departure) 到迁入地 (place of arrival, place of destination) 的变化。这种迁移被称为永久性迁移, 它不同于其它形式的、不涉及永久居住地变化的人口移动。”

(United Nations, 1982) 最早对人口流动进行研究的是英国统计学家列文斯坦, 他主要从人口数量的机械变动的角度来认识人口流动; 而目前人口学工作者多通过人口流动过程中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因素来分析流动人口; 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则认为应从流出地及流入地社会结构变化来系统考察进而认识人口流动; 行为学学者则认为人口流动是一种动机性行为, 应把流动者个人及家庭流动的动因作为分析的切入点¹。

西方较为流行的人口迁移理论是“推拉理论”, 认为人口迁移发生的原因是由于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之间的交互作用而成的²。简单地说, 迁移的推力拉力理论认为, 迁移行为发生的原因是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推力 (或称排斥力) (push factors) 和拉力 (或称吸引力) (pull factors) 共同作用的结果。莱文斯坦认为, 人口迁移以经济动机为主, 虽然受压迫, 受歧视, 气候条件不佳等因素也是促使人口迁移的原因, 但是, 人口迁移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因素, 是人们追求生产和生活条件改善的欲望促使人口迁移³。李 (Lee) 的人口迁移推力拉力理论分为四个方面: 影响迁移的因素, 迁移量, 迁移的流向和迁移者特征。

江立华的人口迁移推拉理论认为, 农村经济转型产生的推力和城市经济发展

¹摘自钟水映:《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 第4页,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²摘自沈益民:《中国人口迁移》, 第11页,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年08月第1版。

³摘自段成荣:《人口迁移研究: 原理与方法》, 第49页, 重庆出版社, 1998年。

产生的拉力，这两种力量的结合成为人口迁移的动力。农村经济转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改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业产量，也使农村释放出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正是由于农业的这种快速发展，一方面释放出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农村各方面落后的生活条件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进而形成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推力。城市对人口迁移的拉力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雇佣机会多，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为广大劳动者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二是工资收入高，对城市的预期高收入，作为就业场所和繁荣之地的声誉对农村贫困劳动者有着持久的吸引力，城市就像一个大引力场，吸引着农村的居民。三是救济水平高，大量在农村无以维生的贫困者流向城市，希望在这里得到救济。四是文化生活的魅力，城市在生活环境、文化和娱乐设施等方面要比农村强得多，这也对农村居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⁴。

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我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句成语形象而又深刻地反映出人口迁移的实质。根据人口迁移理论，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自然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婚姻家庭因素和经济因素。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包括气候、土壤、水和矿藏等是最主要的。虽然自然环境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人类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对自然适应、控制能力的增强，自然环境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正在减弱。社会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交通和通讯事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均从不同方面影响着人口迁移。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是人类生活的最重要的场所，而婚姻则是组建家庭的基本途径和前提。所以婚姻家庭对人口迁移也有着较为显著影响。经济因素是引起人口迁移的最根本原因，许多研究表明，自愿性的人口迁移的根本影响因素是经济因素。人们迁移的目的大多数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经济收入，从而能够有更高的生活水平⁵。

（2）生活质量（QOL）理论

生活质量概念的界定。生活质量是一个人们很容易理解但又很难精确定义的

⁴ 参考江立华：《英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发展》，第43-57页，中国人口出版社，2002年07月第1版。

⁵ 同上：脚注4

范畴,关于生活质量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于1958年提出来的。我国早期生活质量的研究侧重于经济学角度,其概念最早出现于厉以宁198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他指出,“生活质量是反映人们生活 and 福利状况的一种标志,它包括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内容,生活质量的自然方面是指人们的生活环境的美化、净化等等;生活质量的社會方面是指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生活服务状况、社会风尚和社会治安秩序等等”(厉以宁,1986)⁶。

有关生活质量的研究表明,对生活质量所作范畴界定主要有两种类型:主观感受型生活质量和客观条件型生活质量。主观感受型生活质量又称为可感生活质量,即人们所感觉到的或所承担的生活质量,注重个体对社会的主观感受。198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在对生活质量研究进展作全面和系统总结时,曾指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反映了比较稳定与长久的态度和意愿,而生活幸福感则仅仅反映了个人一时或一瞬间的情绪,具有不确定性,这种研究思路必然使研究者把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作为生活质量研究的基本概念。而客观条件型生活质量是指在对生活质量操作化内涵进行界定时,将其研究重点放在影响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的客观指标方面,即着重进行社会指标的研究⁷。

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中国学界对生活质量综合指数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80年代初,当代意义上的社会指标体系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对衡量生活质量的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就更是无从谈起了。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中国生活质量的研究,是对莫里斯的PQLI⁸研究体系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全面的衡量中国生活质量的综合指数。生活质量的基本方面有五个,即教育、健康、物质生活、社会公平和生活环境,其中教育和健康是生活质量的两个最主要的方面(徐慷,1995)。所以生活质量综合指数包括五个方面及其七个指标是:

一是教育方面:识字率(15岁以上)和小学净入学率;

二是健康方面:平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

三是物质生活方面:每天供给热量占需要量的百分比;

四是社会公平方面:收入分配中最低收入的五分之一除以最高收入的五分之

⁶ 摘自周长城:《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第4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⁷ 摘自徐慷:《生活质量论》,第1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⁸ 注释:PQLI即莫里斯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包括三个指标,婴儿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和识字率。

一所得百分比:

五是生活环境方面: 获取安全饮用水人口的百分比。

2.3.2 生活满意度评价框架的理论假设

根据人口迁移推拉理论,人们选择迁移流动的最大目的是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改善生活工作环境、拓展发展空间、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而生活质量理论则告诉我们,良好的教育环境、健康的身体,丰富的物质生活,享受社会公平待遇,优良的生活环境,这五个方面都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从而影响到人们对自己生活工作的满意度。借鉴已有的研究以及本人理解,提出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理论框架。

通过上一小节对人口迁移原理理论的归纳,生活质量理论及其评价指标,并以人口迁移原理为理论依据,我们不妨做出如下理论假设:将影响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划分为以下四大类:(1)人口因素,(2)社会因素,(3)经济因素(4)工作状况。

人口迁移与流动的目的是提高生活质量,期望能够从生存、生活、发展、工作和经济等方面的状况得到提高,而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人口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工作状况等四大方面。而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则由其流动的期望和生活质量现状共同决定。

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结构图如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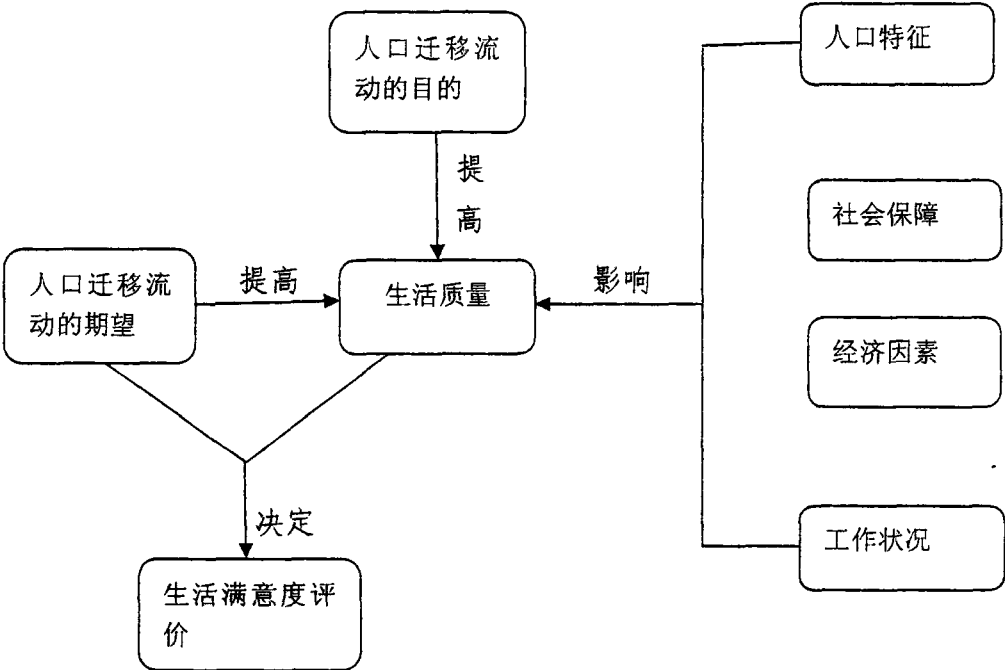


图 2.1 影响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评价的机理和理论框架

2.3.3 指标选择与解释

根据数据资料的实际情况，本研究选择四大类因素作为具体分析指标：

人口特征因素：性别、受教育程度、有无配偶、家庭地位满意度、身体健康自评、子女数量；

经济状况因素：是否有收入、收入水平满意度、是否有房产；

社会保障因素：是否有社会养老保障、是否有社会医疗保障；

工作状况因素：工作环境满意度、劳动强度满意度、工作稳定性满意度、发展前途满意度和职位级别。

(1) 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这一大类中包含的变量有性别、受教育程度、有无配偶、子女数量和家庭地位满意度等四个因素。性别对人口流动性有着基础性的影响作用，因为性别决定着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由于本文采用的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生活满意度”这一主观色彩浓重的指标，所以受教育程度在流动人口的生活各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从而对研究结论产生很大影响；问卷中设置的题目是受访者的婚姻状况，为了配合本模型的需要，本文将已婚者归为有配偶一类，其

他选项,诸如未婚,离婚,丧偶等三项则列为没有配偶一类。流动人口在外生活中是否有配偶作为陪伴对其生活满意度也有着较大影响;子女数量一方面反映出一个人的家庭状况,另一方面还能反映其养育小孩的经济负担:一个人的家庭地位满意度直接影响着家庭对她的情感支撑程度,进一步关系到生活满意度状况。显而易见地,劳动者的身体因素决定着其健康状况,而身体健康状况的好坏决定了一个人的工作资本,故而将健康状况作为一个影响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基本因素。

(2)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这一大类中本文选取了是否有社会养老保障和是否有社会医疗保障这两个变量。社会养老保障是一个人老年时的依靠,能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解决老年人的后顾之忧,流动人口是否享受社会养老保障直接决定着现期的工作意愿和必要,所以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很大的影响;社会医疗保障则是大多数人的-把保护伞,对于保障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减轻个人和家庭的负担有着积极的作用,流动人口是否享受社会医疗保障对其生活满意度也有着较大影响。

(3)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这一大类中本文选取了三个变量,分别是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收入水平,是否有自己名下的房产。经济状况是决定一个人的健康和期望寿命的决定性因素,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则是人们决定是否外出的决定性因素,所以该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高低起到关键性作用;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经济状况,所以也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是否有自己名下的房产以实物的形式体现了一个人的经济水平,从而影响了其生活满意度。

(4) 工作因素

外出务工是人口流动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一份工作的好坏,对工作各方面情况满意与否直接影响到总体生活满意度水平,在这里本文选取了五个变量来对工作因素进行探讨,分别是工作环境满意度、劳动强度满意度、工作稳定性满意度、发展前途满意度和职位级别。工作环境是对单位客观环境的描述,对劳动者的身心都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也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一定影响;劳动强度满意度的高低则是劳动者对工作的切身感受,适中的劳动强度不会伤害到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劳动者对工作稳定性的满意程度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的生活稳定性,

进而关系到劳动收入等重要的经济状况,所以可以更直观地表现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一份工作的发展前途直接关系到劳动者未来经济状况能否得到改善或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提高,进而直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所以对生活满意度有着深远的影响。职位级别代表了流动人口在外的工作成就,并且职位级别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薪资待遇水平,进而决定了流动人口的经济状况,所以也将职位级别选为评价指标之一。

3 浙江省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及生活满意度

3.1 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

本小节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浙江地区的调查数据。对于浙江省流动人口的流动特点的分析，本文将从五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分别是流动人口的规模、年龄构成、文化程度、从事职业和流动原因。研究思路是，先分析总体流动人口，再分男性和女性，分别针对以上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来观察男女两性流动人口的特点有何差异性 or 同质性。

3.1.1 规模

根据六普短表数据显示，截至 2010 年，浙江省流入人口规模总计达到 1990.09 万人，其中男性流动人口为 1063.09 万，占流动人口总数的 53.4%；女性流动人口约为 927 万，占流动人口总数的 46.6%。由此可见，虽然男性仍然是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但女性流动人口的数目也不容忽视，两者占比仅相差 6.8 个百分点。

表 3.1 浙江省流入人口规模

	男	女	合计
人数	10630895	9269968	19900863
百分比	53.4	46.6	100.0

注：本表数据来源于六普短表统计数据。

本文还将浙江省流入人口分为省内跨县和省外流入两类来分析性别构成，发现省外男性流入人口占比高于跨县男性流入人口的占比，这说明了省外的男性流动人口较省内男性流动人口而言人数更多，流动性更强，反之，省内跨县的女性流动人口较省内女性流动人口而言人数更多，流动性更强，表明女性更倾向于省内短距离流动。

3.1.2 年龄构成

浙江省总体流入人口从年龄结构上看,若将流入人口分为少儿组(0-14岁),劳动年龄组(15-64岁),和老年组(65岁及以上),这三组年龄段内,男性人数均高于女性。可以看出,流入人口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组为主体,占全体流入人口的87.6%,其中男性为46.6%,女性为41%。流入人口占比最少的是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仅占2.2%。说明浙江省的流动人口以劳动年龄为主,并且男性多与女性。

表 3.2 2010 年浙江省流入人口的性别和年龄构成

	总体	男		女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0-14	10.2	1126539	10.6	907084	9.8
15-64	87.6	9271821	87.2	8157865	88.0
65+	2.2	232485	2.2	204896	2.2
合计	100	10630845	100	9269845	100

进一步按10岁一组将流入人口分成8组,来分析浙江省流入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构成,如表3.3,仅在70岁以上年龄组里男性人口占比略低于女性,而其余年龄组均是男性人数占比高于女性。年龄在20-29岁之间的人最多,占比为28.3%,其次是30-39岁和40-49岁年龄组,占比分别为24.1%和17.9%,这三个年龄组合计占省内跨县流入人口总数的70.3%,说明了省内跨县流入人口的年龄大部分集中在20-49岁之间,即为中青年人口。

表 3.3 2010 年浙江流入人员的性别和 10 岁一组的年龄构成

	合计		男		女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0-9	1438594	7.2	794237	7.5	644357	6.7
10-19	2519127	12.7	1322049	12.4	1197078	12.5
20-29	5633926	28.3	2905899	27.3	2728027	28.6
30-39	4793720	24.1	2592864	24.4	2200856	23
40-49	3555330	17.9	1938878	18.2	1616452	16.9
50-59	1204133	6.1	672436	6.3	531697	5.6
60-69	483258	2.4	263902	2.5	219356	2.3
70+	272775	1.4	140580	1.3	413355	4.3
合计	19900690	100	10630845	100	9551178	100

本文还将浙江省流入人口分为省内跨县和省外流入两类来分析性别和年龄构成。由于篇幅有限，不再将数据全部贴出。通过将两者进行比较，分析两者的差异性，发现存在以下两点规律：

- 第一、10-19 岁年龄组的省内跨县流入人口占比高于省外流入人口的占比，这说明了低龄人口的流入数量，省内跨县流入比省外流入更高；
- 第二、20-49 岁年龄组的省外流入人口占比比省内跨县流入人口占比高，这说明了在中青年人口的流动性方面，省外流入人口比省内跨县流入人口更强。

3.1.3 受教育程度

如下图 3.1 所示，总体上来看，浙江省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还发现低受教育程度组（未上过学和小学文化）都是女性人数占比高于男性，较高教育程度组（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都是男性人数占比高于女性。这说明了男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整体上高于女性流动人口。并且初中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人数最多，占比合计为 46.8%，其中男性 26.1%，女性为 20.7%，其次是小学教育程度，合计占比为 23.5%。小学和初中教育程度的人数合计占流动人口总数的 70.3%，说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处于较低水平的义务教育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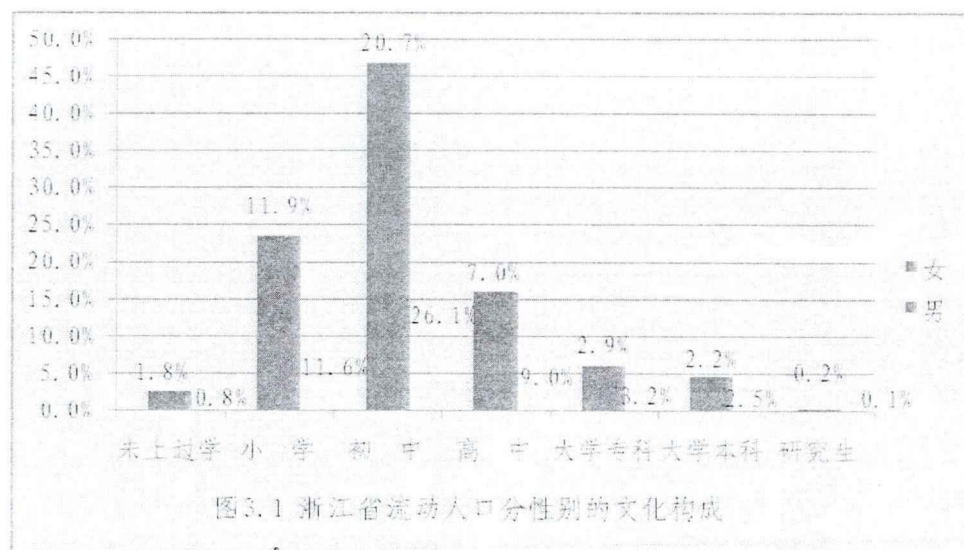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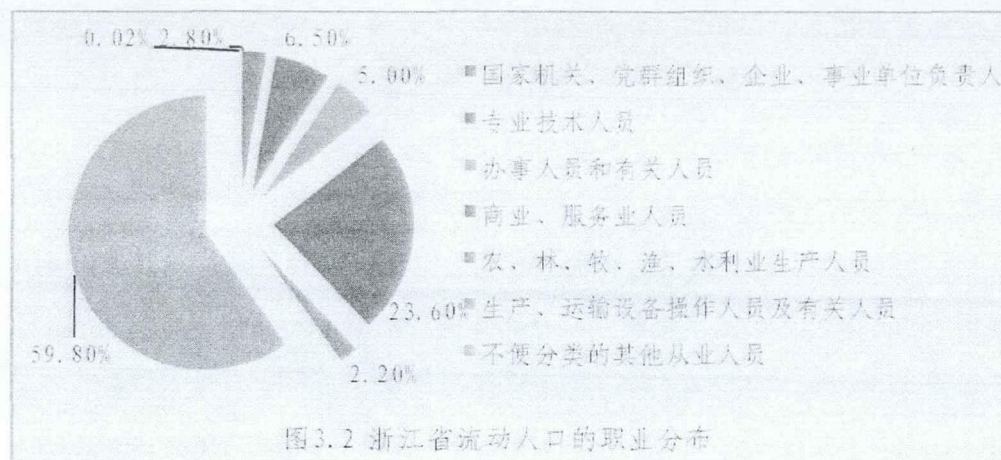


图3.1 浙江省流动人口分性别的文化构成

3.1.4 职业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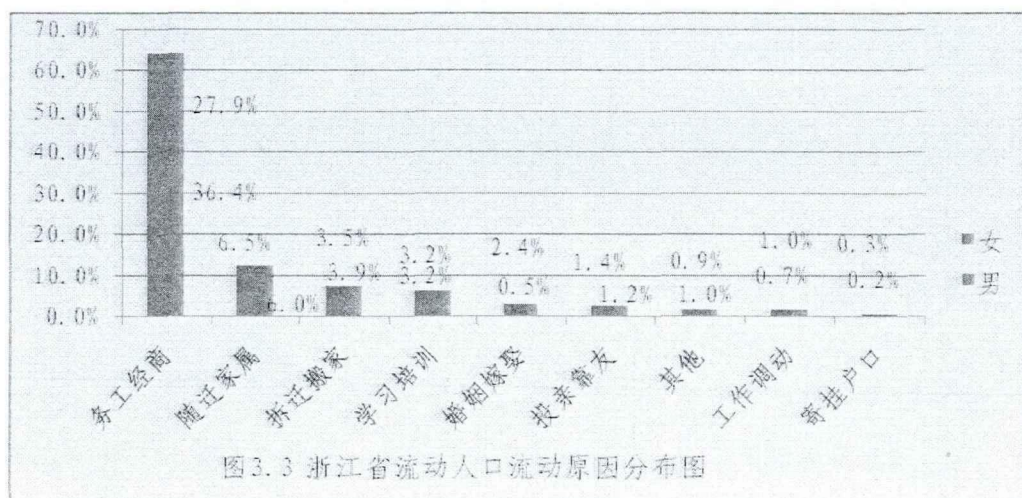
六普数据中，涉及到流动人口的职业的数据共有 1424205 份，将职业划分为七大类，分别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专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剩下的统归为不变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将不同职业类型的人数比例做成饼图，分布如下图 3.2 所示：

从业人数最多的职业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有 851964 人，占总受访人数的 59.8%，说明浙江省流动人口主要从事一线的基层劳动。其次是商业服务业，人数为 336561 人，占比位 23.6%，这表明浙江省第三产业吸纳了相当大的流动人口。从业人数最少的职业是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仅有 31402 人，占比为 2.2%，这说明了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大多脱离了第一产业的农业生产，这也正好符合人口流动的规律和目的。



3.1.5 外出原因

将浙江省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分为九大类，按人数占比从高到低依次排列，分别为务工经商、随迁家属、拆迁搬家、学习培训、婚姻嫁娶、投亲靠友、其他、工作调动和户口记挂。因务工经商流动的人数有 12796350 人，占流动人口总数的 64.3%，其中男性占 36.4%，女性占 27.9%，两者差距 8.5%，说明男性务工经商的人数多于女性。其他流动原因当中，男女两性的差别都不大。其次是随迁家属，有 2483700 人，占比为 12.5%。因寄挂户口而迁移流动的人数最少，仅有 96567 人，占比为 0.5%。总体上浙江省流动人口还是以出门务工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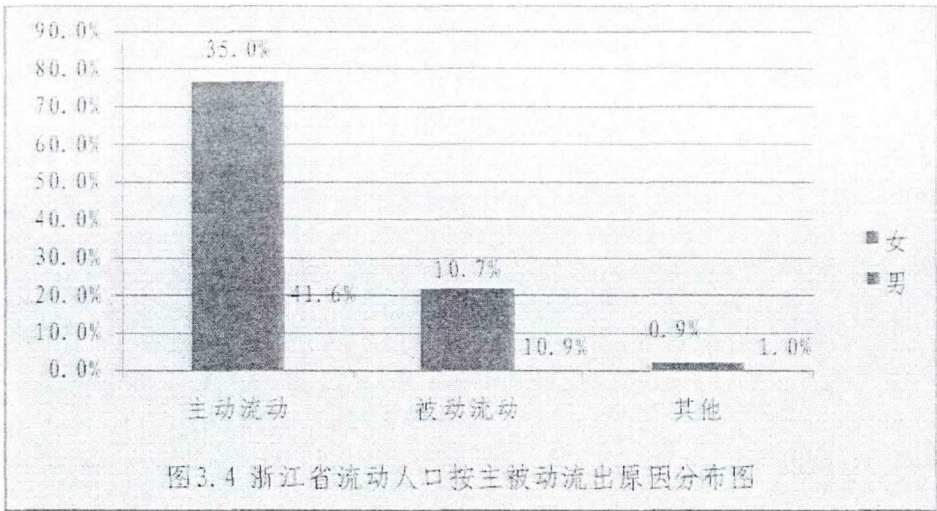


为了进一步从主观上找出浙江省流动人口流动的原因，本文将以上九点原因

按主、被动因素重新分为三大类，主动流动：务工经商、学习培训、婚姻嫁娶、投亲靠友、记挂户口；被动流动：随迁家属、拆迁搬家、工作调动；以及其他原因。

如图 3.4 所示，浙江省流动人口中主动流出人数占比为 76.6%，而被动流出人数占比仅为 21.6%。这表明流入到浙江省的人口多以主动性质的务工经商和学习等原因为主。并且男性主动流动人口占比要高于女性 6.6 个百分点，表明主动流动方面男女两性人口有一定的差异性；而被动流动方面男性两性人口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男性占比 10.9%，女性占比 10.7%。这表明庞大的女性流动人口大多以主动流出为主，不再是八九十年的跟随流动。

综上分析，浙江省的流入人口，年龄普遍较轻、文化程度较低、职业层次较低，目的以务工经商为主，这部分人群流动的动力是为了寻求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生存环境和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3.2 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双变量交叉列表分析

本部分采用的数据来自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浙江数据。先分析流动人口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情况，然后主要是分析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将可能的影响因素分别与生活满意度做交叉列联表分析，根据卡方检验结果，初步判断两个变量的相关显著性关系。并且同时将对男性流动人口与女性流动人口在外出期间

的生活状况进行对比分析。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问卷请被调查者对自己外出期间的工作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作出评价,评价等级分为五级:很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由于有些满意等级的评价人数很少,为了体现出个等级间的差异性,在此将这五个等级归为三类:满意、一般、不满意。其中满意包括很满意和比较满意,不满意包括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

3.2.1 生活满意度描述性分析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问卷中符合本文研究对象的受访者有 409 位,其中,405 人对生活满意度作出了评价,有 4 人“说不清”,本文作缺失值处理。如表 3.4 所示,有 186 人选择了“满意”,此选项人数最多,占比为 52.8%,即为总体满意水平;152 人选择了“一般”,占比为 37.5%;选择“不满意”的人数占比 9.6%。表明浙江省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以“满意”居多。

再分性别分析男性流动人口和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分布情况:

405 位流动人口中有 227 位男性,选择“满意”的有 115 人,占比为 50.6%;选择“不满意”的有 29 人,占比为 12.7%;83 人选择了“一般”满意,占比为 36.6%。这表明男性流动人口 50.6%的生活满意水平低于总体流动人口 52.8%的平均生活满意水平;而不满意水平又比总体流动人口的平均水平高 3.1 个百分点。男性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低于总体流动人口的平均生活满意水平。

余下的 178 名女性流动人口中,选择“满意”的有 99 人,占比为 55.6%;选择“一般”的有 69 人,占比为 38.8%;选择“不满意”的人数占比分别为 5.7%。与总体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相比,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水平为 55.6%,高于总体水平(52.8%);不满意水平为 5.7%,也低于全省总体水平(9.6%),这表明浙江省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高于总体流动人口的平均水平。

表 3.4 浙江省流动人口分性别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分布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合计
总体	人数	214	152	39	405
	百分比	52.8	37.5	9.6	100
男	人数	115	83	29	227
	百分比	50.6	36.6	12.7	100
女	人数	99	69	10	178
	百分比	55.6	38.8	5.7	100

3.2.2 人口因素与生活满意度

(1) 性别与生活满意度

浙江省流动人口性别与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列联表显示: 男性流动人口数量占比比女性流动人口高出 12 个百分点, 总体上流动人口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趋向于满意, 占比为 52.8%, 其次是“一般”满意, 占比为 37.5%, 总体满意水平超过 50%。男性和女性对生活满意度的选择与总体水平趋势一致, 都体现出向“满意”组合集中的趋势, 分别为 50.6%和 55.6%, 其次是对“一般”满意的选择, 男性为 36.8%, 女性为 38.8%。总体上对生活不满意的人数占比为 9.6%, 男性为 12.7%, 女性为 5.7%。对比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水平, 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比男性高 5 个百分点, 且女性流动人口的不满意水平比男性低 7 个百分点。

根据卡方检验结果 $\text{sig}=0.097>0.05$, 所以不同性别的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性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上未通过卡方检验, 性别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不具有显著性。

表 3.5 流动人口的性别与生活满意度交叉列联表

性别	人数占比	生活满意度			合计%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男	56	50.6	36.0	12.7	100
女	44	55.6	38.8	5.7	100
合计	100	52.8	37.5	9.6	100

注: 卡方统计量 $\text{sig}=0.097>0.05$, 相关性不显著。

(2) 受教育程度与生活满意度

表第二列显示的是流动人口的不同教育程度的人数分布, 可知初中教育程度

的人数最多，人数占比为 50.1%，其次是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占比为 25.9%，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数最少，仅占 24%，表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将六个等级的教育程度划分为三类，分别为小学及以下（包括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初中，高中及以上（包括高中，中专/中技，大学及以上）。各教育程度间差异情况，三种阶段的教育程度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的分布皆体现出向“满意”组合集中的趋势，分别为 51.4%，51.7%和 56.7%，可见小学及以下和初中这两种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选择生活满意的人数占比高于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其次是“一般”选项的人数占比较高，分别为 34.3%，37.9%和 40.2%，同样是前两种较低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人数占比低于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三种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选择不满意的人数占比最少，小学及以下和初中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占比分别为 14.3%和 10.3%，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选择不满意的人数占比仅为 3.1%，可见学历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这种趋势反映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生活满意度较高。

根据卡方检验结果 $\text{sig}=0.072>0.05$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之间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性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上未通过卡方检验，受教育程度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不具有显著性。

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的受流动影响人群主要为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所从事的工作很少是依靠学历获得的，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这一群体的日常工作生活起到的作用并不大，所以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不显著。

表 3.6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生活满意度交叉列联表

	人数占比	生活满意度			合计%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小学及以下	25.9	51.4	34.3	14.3	100
初中	50.1	51.7	37.9	10.3	100
高中及以上	24.0	56.7	40.2	3.1	100
合计	100	52.8	37.5	9.6	100

注：卡方统计量 $\text{sig}=0.072>0.05$ ，相关性不显著。

（3）婚姻状况与生活满意度

表 3.7 第二列显示的是流动人口的总体婚姻状况,可知流动人口中有配偶的人数最多, 占比为 76.5%, 无配偶的人数占比为 23.5%。这表明流动人口中已婚居多。

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与生活满意度交叉列联表如表 3.7 所示: 总体上来看, 有配偶和无配偶两种婚姻状态的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体现出向“满意”集中的趋势, 占比分别为 47.4%和 54.5%; 其次是“一般”选项, 占比分别为 47.4%和 34.5%; 选择“不满意”的人数占比最少, 有配偶的流动人口为 11%, 无配偶的流动人口仅为 5.3%。所以两种婚姻状态的流动人口总体上对生活较为满意。横向比较两种婚姻状态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可知, 有配偶的流动人口对生活的“满意”水平高于无配偶者, “不满意”水平也高于无配偶者, 所以可以看出有配偶的流动人口在三种不同程度的满意水平的选择上波动更大, 差异性更明显, 而无配偶的流动人口在三种不同满意水平上的选择相对平缓。

根据卡方检验结果 $\text{sig}=0.042<0.05$, 表明不同婚姻状况的流动人口之间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性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卡方检验, 婚姻状况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具有显著性。

表3.7 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与生活满意度交叉列联表

婚姻状况	人数占比	生活满意度			合计%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无配偶	23.5	47.4	47.4	5.3	100
有配偶	76.5	54.5	34.5	11	100
合计	100	52.8	37.5	9.6	100

注: 卡方统计量 $\text{sig}=0.042<0.05$, 相关性具有显著性。

(4) 家庭地位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

流动人口对家庭地位的满意程度体现出向“比较满意”集中的趋势, 占流动人口总数的 50.7%, 流动人口中对家庭地位感到很满意的人数占比为 37.9%, 家庭地位的满意水平达到 88.6%(包括很满意和比较满意), 仅有 2.2%的流动人口不满意自己的家庭地位。这表明流动人口的家庭地位满意度普遍较高。

通过流动人口的家庭地位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列联表分布可知, 总体上生活满意水平最高的是同时对家庭地位也感到“很满意”的流动人口, 占比为

60.8%；与之相对应的是，生活不满意水平最高的是同时对家庭地位也感到“不满意”的流动人口。横向对比不同家庭地位满意度，可知对家庭地位感到“很满意”“比较满意”和“一般”的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集中于“满意”的状态，占比分别为 60.8%、50.2%和 44.4%；而对家庭地位“不满意”的受访者则体现出向“一般”组合集中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总结规律是，随着家庭地位满意度的降低，受访者对生活满意度的选择程度也随之下降，直到降到“不满意”，这表明家庭地位满意度的高低与生活满意度呈正比关系：即对家庭地位满意度越高，生活满意度就越高。

根据卡方检验结果 $\text{sig}=0.023<0.05$ ，不同水平的家庭地位满意度之间生活满意度差异性分布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卡方检验，家庭地位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具有显著性。

表3.8 流动人口的家庭地位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交叉列联表

家庭地位满意度	人数占比	生活满意度			合计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满意	37.9	60.8	29.4	9.8	100
比较满意	50.7	50.2	42.0	7.8	100
一般	8.9	44.4	41.7	13.9	100
不满意	2.5	20.0	50.0	30.0	100
合计	100	53	37.4	9.7	100

注：卡方统计量 $\text{sig}=0.023<0.05$ ，相关性具有显著性。

（5）子女数量与生活满意度

总体上来看，流动人口中只有 3.5%的人没有子女，大部分的流动人口拥有子女数目为 1，独生子女的人数占比为 47.2%；其次是拥有两个孩子，双生子女的人数占比为 41.8%；少部分人拥有 3 个及以上的孩子数量，人数占比为 7.5%。

根据子女数量与生活满意度的交叉表可知，没有孩子的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最高，达到 63.6%，且不满意水平最低，仅为 9.1%；其次是拥有 2 个和 3 个及以上数量孩子的流动人口，其生活满意水平分别为 56.4%和 58.3%，并且生活不满意水平相对高于其他孩子数量的流动人口，分别为 12%和 12.5%；选择生活“满意”的人数占比最低的是只拥有一个孩子的流动人口，为 52%。从集中趋势来看，拥有不同数量孩子的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都体现出向“满意”组合集中的趋势，

其次是“一般”满意组合。并且孩子数量最多的流动人口选择生活不满意的人数占比最多；孩子数量最少（无子女）的流动人口选择满意的人数占比最多，选择不满意的人数占比最少。

根据卡方检验结果 $\text{sig}=0.913>0.05$ ，不同子女数量之间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性分布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上未通过卡方检验，子女数量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不具有显著性。

表 3.9 流动人口的子女数量与生活满意度交叉列联表

子女数量	人数占比	生活满意度			合计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0	3.5	63.6	27.3	9.1	100
1	47.2	52	38	10.0	100
2	41.8	56.4	31.6	12	100
3个及以上	7.5	58.3	29.2	12.5	100
合计	100	54.7	34.3	11	100

注：卡方统计量 $\text{sig}=0.913>0.05$ ，相关性不具有显著性。

（6）健康状况与生活满意度

身体因素中只选择了流动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作为观测变量，问卷中设置的选项有：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

如表 3.10 第二列所示，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普遍较好，认为自己较为健康的流动人口占比达到 80%（包括很好和较好）。健康状况的五种级别的健康状况按照从好到不好的递减趋势排列，人数占比也逐渐下降。

根据健康状况自评与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列表可知，健康状况为“很好”的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水平最高，为 60.9%；其次是健康状况为“较好”的流动人口，生活满意水平为 48.3%。从集中趋势来看，身体状况为“很好”、“较好”和“一般”的流动人口对生活满意程度体现出向“满意”集中的趋势。并且健康状况自评为很好的流动人口对生活感到“满意”的人数占比最多，同时对生活感到“不满意”的人数占比最少；健康状况自评为“较差”的流动人口选择生活“满意”的人数占比最少，而选择“不满意”的人数占比最高，达到 31.8%，显然两者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根据卡方检验结果 $\text{sig}=0.000<0.001$ ，可知不同健康状况之间生活满意度的

差异性分布在 0.001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卡方检验，健康状况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具有显著性。

表3.10 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与生活满意度交叉列联表

健康状况	人数占比	生活满意度			合计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好	44.2	60.9	34.1%	5.0%	100
较好	35.8	48.3	42.1%	9.7%	100
一般	14.6	45.8	39.0%	15.3%	100
较差	5.4	36.4	31.8%	31.8%	100
合计	100	52.8	37.5%	9.6%	100

注：卡方统计量sig=0.000<0.001，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相关性具有显著性。

3.2.3 社会因素与生活满意度

(1) 是否有社会养老保障与生活满意度

根据表 3.11 第二列可知，流动人口中享有社会养老保障的人数占比为 48.4%，51.6%的流动人口没有养老保障，表明社会养老保障在流动人口中的覆盖率较低。

根据流动人口是否有社会养老保障与生活满意度交叉表可知，总体上有社会养老保障的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水平更高，为 57.4%，而没有社会养老保障的流动人口的满意水平仅为 49%。从集中趋势来看，无论是否享受社会养老保障，受访者皆体现出向“满意”组合集中的趋势，其次是“一般”满意程度。并且有社会养老保障的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水平高于无社会养老保障的流动人口，不满意水平则低于无社会养老保障的流动人口。

根据卡方检验结果 sig=0.229>0.05，可知有和没有社会养老保障之间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性分布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上未通过卡方检验，是否有社会养老保障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不具有显著性。

究其原因，根据前文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可知，浙江省流动人口以中青年为主，尽管社会养老保障很重要，但对于流动人口目前的生活质量影响不大，因为流动人口偏于年轻，养老保障暂时还不能显现其保障老年生活的效果。

表3.11 流动人口是否有社会养老保障与生活满意度交叉列联表

	人数占比	生活满意度			合计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没有	51.6	49	40.9	10.1	100
有	48.4	57.4	33.3	9.2	100
合计	100	53.1	37.2	9.7	100

注：卡方统计量sig=0.229>0.05，相关性不具有显著性。

(2) 是否有社会医疗保障与生活满意度

根据表 3.12 第二列可知，社会医疗保障在流动人口中的总体覆盖率是 79.4 %，仅有 20.6%的流动人口没有享受社会医疗政策，表明社会医疗保障在流动人口中的覆盖率大大高于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

根据是否有社会医疗保障与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列联表可知，有社会医疗保障的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水平为 55%，没有社会医疗的流动人口满意生活水平为 44.6%。比前者低 5.4 个百分点。从组合集中趋势来看，有社会医疗保障的流动人口体现出向“满意”组合集中的趋势，占比为 55%，其次是“一般”满意组合，占比为 35.3%；而无社会医疗保障的流动人口则集中于“一般”满意组合，占比为 45.8%，其次是“满意”组合，占比为 44.6%。两者在不满意水平上的差异性也很小，差距仅为 0.1 个百分点。

根据卡方检验结果 sig=0.194>0.05, 可知有和没有社会医疗保障之间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性分布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上未通过卡方检验，是否有社会医疗保障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不具有显著性。

是否有社会医疗保障与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究其原因，本文将这种现象与受访者的身体因素结合起来分析，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显示，身体因素也并未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笔者认为这两种结果具有内在一致性。因为健康状况与医疗是联系在一起的，根据本文研究显示，受访者的身体素质普遍较好，可见社会医疗保障对这部分人群并没有发挥其本身的福利优势，所以无论流动人群是否享受医疗保障，在日常生活中，这种“隐性保障”体现其功能的机会很少，特别在其他因素的优势对照下，社会医疗保障的显著性就

被掩盖了。

表3.12 流动人口是否有社会医疗保障与生活满意度交叉列联表

	人数占比	生活满意度			合计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没有	20.6	44.6	45.8	9.6	100
有	79.4	55	35.3	9.7	100
合计	100	52.9	37.5	9.7	100%

注：卡方统计量sig=0.194>0.05，相关性不具有显著性。

3.2.4 经济因素与生活满意度

（1）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工作与生活满意度

从表 3.13 第二列可以看出，有 92.1%的流动人口从事的是有收入的工作，这表明浙江省的流入人口以务工为主。

根据流动人口是否有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交叉列联表可知，从事有收入的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水平为 53.1%，高于没有收入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水平，相差 3.1 个百分点。从集中趋势来看，无论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程度皆体现出向“满意”组合集中的趋势。其次是“一般”满意组合，，选择“不满意”的人数占比最少。纵向比较有收入和无收入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可以看出，有收入流动人口选择生活满意的人数占比高于无收入者，并且有收入流动人口选择生活不满意的人数占比，比无收入者低了 6.5 个百分点，可见是否有收入对流动人口选择生活满意程度起到明显的作用。

根据卡方检验结果 sig=0.19>0.05，可知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工作之间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性分布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上未通过卡方检验，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工作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不具有显著性。

表3.13 流动人口是否有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交叉列联表

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工作	人数占比	生活满意度			合计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是	92.1	53.1	37.8	9.1	92.1
否	7.9	50	34.4	15.6	7.9
合计	100	52.9	37.5	9.6	100

注：卡方统计量sig=0.19>0.05，所以是否有收入与生活满意度呈弱相关，相关性不具有

显著性。

(2) 收入水平与生活满意度

本问卷对受访者的收入水平这一问题设置了以下几个主观选项，以保护受访者隐私，答案选项分别是很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五个选项。

根据表 3.14 的第二列可知，流动人口对自己的收入水平的总体满意水平为 39%。其中对收入水平感到一般的人数最多，占比为 49%；选择不满意的人数最少，仅占 12%。流动人口对收入水平的满意度普遍不高。

根据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交叉列联表可知，对收入水平感到满意的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水平最高，为 70.8%，横向对比各种收入水平满意度，可知对收入水平感到“满意”或“一般”的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集中于“满意”的状态，占比分别为 70.8%和 48.3%；对收入水平“不满意”的受访者选择生活满意的人数占比最低，仅为 12%，并且选择生活不满意的人数占比最高，为 26.2%，生活满意度的感受集中表现为“一般”，占比为 54.8%；总结规律是，随着对收入水平满意程度的降低，受访者对生活满意度的选择程度也随之下降，这表明收入水平的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呈正比关系，即对收入水平的满意度越高，生活满意度就越高。并且对收入水平感到满意的流动人口在选择不同水平的生活满意程度上的差异性更明显。

根据卡方检验结果 $\text{sig}=0.000<0.001$ ，可知不同满意程度的收入水平之间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性分布在 0.001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卡方检验，收入水平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具有显著性。

表3.14 流动人口收入水平与生活满意度交叉列联表

	人数占比	生活满意度			合计%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	39	70.8	25.5	3.6	100
一般	49	48.3	45.3	6.4	100
不满意	12	19	54.8	26.2	100
合计	100	53.6	38.7	7.7	100

注：卡方统计量 $\text{sig}=0.000<0.001$ ，相关性具有显著性。

(3) 是否有房产与生活满意度

为了更好地体现流动人口的经济水平，特在此将“是否有自己名下房产选做经济因素的变量之一。根据统计显示，仅有 24.9%的流动人口拥有自己名下房产，这表明大部分流动人口的住房得不到保障。

而根据下表 3.15 流动人口是否有房产与生活满意度交叉列联表可知，有自己名房产的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水平为 53.4%，略高于没有自己名下房产的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水平 52.7%，两者仅相差 0.7 个百分点。从集中趋势上看，有和没有自己名下房产的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程度都体现出向“满意”组合集中的趋势；其次是向“一般”满意组合集中，人数占比分别为 32.7%和 39.1%。并且可以看出有自己名下房产的流动人口对生活感到“不满意”的人数占比高于没有自己名下房产的流动人口，两者相差 5.6 个百分点。本文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有自己名下房产的流动人口因背负房贷，反而经济压力和负担更大，所以这些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反而低于无自己名下房产的流动人口。

根据卡方检验结果 $\text{sig}=0.287>0.05$ ，可知是否有自己名下房产之间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性分布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上未通过卡方检验，是否有自己名下房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不具有显著性。

表明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是否有自己名下房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根据前面分析数据可知，流动人口中有自己名下房产的人数占比仅为 24.9%，即绝大部分流动人口没有自己名下房产。这跟流动人口本身的特性是一致的，因为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是有区别的，人口迁移涉及到永久性定居，但是人口流动可能只是短期的地域流动，因此，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流动人口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买房置业，另一方面考虑到其流动性，也没有买房置业的必要。所以，是否有自己名下房产并不在流动人口关心的范围之内，故而与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表3.15 流动人口是否有房产与生活满意度交叉列联表

是否有自己名下房产	人数占比	生活满意度			合计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没有	75.1	52.7	39.1	8.3	100
有	24.9	53.4	32.7	13.9	100
合计	100	52.8	37.5	9.6	100

注：卡方统计量 $\text{sig}=0.287>0.05$ ，相关性不具有显著性。

3.2.5 工作因素与生活满意度

工作因素中选取了五个可能影响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自变量,分别是职位级别,工作环境满意度,劳动强度满意度,工作稳定性满意度和发展前途满意度。五个变量都通过 0.001 显著水平的卡方检验。

根据对比工作环境满意度、劳动强度满意度和工作稳定性满意度这三个因素与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分布情况,发现工作环境满意度、劳动强度满意度和工作稳定性满意度这三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具有相似特征,所以将三者放在一起分析。工作环境满意度,劳动强度满意度,工作稳定性满意度这三个指标中均是选择“满意”的人数占比最多,总体满意水平分别为 58.6%, 49.1%和 52.3%,其次是“一般”选项,选择人数最少的是“不满意”组合,不满意水平(包括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分别为 5.1%, 8%和 8.1%。从集中趋势来看,对工作环境、劳动强度和工作稳定性感到“满意”的流动人口对生活满意度呈现出向“满意”组合集中的趋势。对工作环境、劳动强度和工作稳定性感到“不满意”的流动人口则对生活的满意度集中表现为“一般”;并且,对这三种因素的满意程度与生活满意度体现出正相关关系,即对这三种因素越满意,生活满意度越高。

发展前途应该是每个工作者最关心的问题,按三个不同满意等级对“发展前途满意度”的满意度进行分类,而在发展前途满意度这一指标中,选择“一般”的人数占比最多,达到 43.7%,其次才是“满意”,总体满意水平仅为 35.7%,选择人数最少的是“不满意”,占比为 20.6%。这表明流动人口对所从事的工作的发展前途普遍满意度偏低。再看集中趋势特征,对发展前途感到“满意”的流动人口集中表现为对生活感到“满意”,而对发展前途感到“不满意”的流动人口则体现出向“一般”组合的生活满意程度集中的趋势,可以发现发展前途的满意度越高,相应的在生活满意度的选择上体现出来的差异性越大。

职位级别的分布差别较为明显,仅有 14.8%的流动人口的职位级别属于管理层,85.2%的流动人口只是属于普通职工。处于管理层的流动人口对生活满意度的选择集中于“一般”满意,人数占比为 45.2%,而属于普通职工的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体现出向“满意”组合集中的趋势,人数占比为 51.7%。处于管理层的流动人口不仅生活满意水平低于属于普通职工的流动人口,并且其选择生活“不满意”的人数占比也高于后者。

表 3.16 流动人口的工作因素与生活满意度交叉列联表

工作因素		人数占比	总体生活满意度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合计
工作环境满意度***	满意	58.6	62.4	33.7	3.9	100
	一般	36.3	44.9	46.5	8.7	100
	不满意	5.1	11.1	44.4	44.4	100
劳动强度满意度***	满意	49.1	65.1	32	2.9	100
	一般	42.6	47	45	8.1	100
	不满意	8.3	20.7	48.3	31	100
工作稳定性满意度***	满意	52.3	65.4	32.4	2.2	100
	一般	39.4	44.5	43.8	11.7	100
	不满意	8.3	27.6	48.3	24.1	100
发展前途满意度***	满意	35.7	69.4	27.3	3.3	100
	一般	43.7	52	41.2	6.8	100
	不满意	20.6	32.9	52.9	14.3	100
职位级别***	管理层	14.8	35.5	45.2	19.4	100
	普通职工	85.2	51.7	44.9	3.4	100

注：本表基于卡方检验，其中***表示在 0.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3.3 本章小结

本章分为两节来介绍浙江省流动人口的流动特点和生活满意度。

第一节是根据六普数据总体上分析归纳浙江省流动人口的特点,分别从流动人口的规模,年龄构成,文化程度,职业构成和流动的原因这五个方面来分析,并且在总体分析的基层上,还分析了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在这五个方面的差异性。

第二节则是利用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来分析浙江省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同样是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分别是人口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工作因素。特点在于分别将这四方面因素与总体生活满意度结合起来,运用 SPSS 软件进行交叉表分析,并且对每方面因素中的每一个因素进行卡方检验,分析这些因素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

本章的主要结论有:

(1) 浙江省流入人口的规模较大,以中青年或劳动年龄人口为主,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普遍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基层工作,以主动流出为主,多是出于务工经商的目的,以改善生活工作为目的;

(2) 通过卡方检验的影响因素有:家庭地位满意度(人口因素 1 个),收入水平满意度(经济因素 1 个),工作环境满意度、劳动强度满意度、工作稳定性满意度、发展前途满意度和职位级别(工作因素 5 个)。表明处于上述七种指标不同状态下的流动人口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是有差异的,七种不同状态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是显著的。

4 浙江省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4.1 计量模型

浙江省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研究的理论研究模型在第二章中已经提出来了，本章将在前面描述性分析以及现有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回归分析。通过对该理论分析模型进行检验，探寻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回归结果进行解释，再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根据理论研究模型，本文选取了上文中介绍过的四大因素作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自变量，即生活满意度受到人口因素（性别、受教育程度、有无配偶、家庭地位满意度、子女数量、健康状况），社会因素（是否有社会养老保障、是否有社会医疗保障），经济因素（是否有收入、收入水平、是否有自己名下房产），工作因素（单位性质、职位级别、工作环境满意度、劳动强度满意度、工作稳定性满意度、发展前途满意度）四大因素的影响，每一大类因素中含有多个变量，由于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是二分类变量，所以本文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方法（Logistic Regression）进行分析拟合。该计量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text{Logit}(p)=\ln\left(\frac{p}{1-p}\right)=\beta_0+\beta_1X_1+\beta_2X_2+\beta_3X_3+\dots+\beta_nX_n$$

或

$$P(y=1/X_1,X_2,\dots,X_n)=\frac{e^{\beta_0+\beta_1X_1+\beta_2X_2+\beta_3X_3+\dots+\beta_nX_n}}{1+e^{\beta_0+\beta_1X_1+\beta_2X_2+\beta_3X_3+\dots+\beta_nX_n}}$$

其中 $X_1, X_2, X_3, X_4, \dots, X_n$ 等代表各个自变量， β_0 是常数项， $\beta_1, \beta_2, \dots, \beta_n$ 等代表各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P 是生活满意度的概率。

确定了本文的计量模型后，接下来将用 SPSS20.0 软件对现有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考察通过卡方检验的七个自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果。

4.2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4.2.1 Logistic 回归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只有家庭地位满意度，收入水平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劳动强度满意度、工作稳定性满意度、发展前途满意度、职位级别这七个指标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具有显著性，本文将这七个因素选为可能影响流动人口的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解释变量构建计量模型。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总体生活满意度中的“很满意”“比较满意”和“一般”划分为一类，设虚拟变量 1=满意（包括“很满意”“比较满意”和“一般”），0=不满意（包括“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

人口因素中的家庭地位满意度属于主观变量；经济因素中的的收入水平满意度属于主观变量；工作因素中除“职位级别”属于客观变量外，其余四个指标均属于主观变量，选取的七个解释变量都可以虚拟为二分类变量，变量虚拟过程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 二分类变量处理结果列表

生活满意度	满意	1	工作环境满意度	满意	1	劳动强度满意度	满意	1
	不满意	0		不满意	0		不满意	0
工作稳定性满意度	满意	1	职位级别	管理层	1	发展前途	满意	1
	不满意	0		普通职员	0		不满意	0
收入水平	满意	1	家庭地位满意度	满意	1			
	不满意	0		不满意	0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所以用 SPSS 20.0 软件中的“Logistic Regression”进行回归分析，可以估计出每一大类因素中的各个自变量的取值相对于另一类参照组的优势比 OR，即 odds ratio。OR 实际上是回归系数的自然指数，它表示在控制其他的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解释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被解释变量发生的概率与不发生的概率的比值，是变化之前的相应比值的倍数，又叫比数比。本文为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倍数。

本节将建立三个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对象分别为总体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和女性流动人口。

(1) 总体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表 4.2 是对 409 位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汇总。我们发现家庭地位满意度、职位级别、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稳定性满意度、发展前途满意度等 5 个自变量对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十分有限，只有收入水平和劳动强度满意度这 2 个自变量最终进入回归方程，并且 sig 值都小于 0.05，表明这两个自变量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在 7 个自变量中，只有这两种因素对流动人口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这两个自变量分别归属于经济因素和工作因素这两大类，家庭地位没有进入到回归方程，表明人口因素对流动人口的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明显；工作因素中的 5 个自变量有 4 个都被剔除，表明工作因素对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亦不大。

通过对比两个自变量的优势比可以看出：收入水平对流动人口选择生活满意程度的影响最大，其优势比为 7.663，表明对收入水平感到满意的流动人口选择生活满意的概率与选择生活不满意的概率的比值，是对收入水平感到不满意的流动人口的同类比值的 7.663 倍。说明了经济状况的好坏对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收入水平满意度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

影响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还有劳动强度满意度，优势比为 2.811，表明对劳动强度感到满意的流动人口选择生活满意的可能性是对劳动强度感到不满意的流动人口的 2.811 倍。说明了劳动强度满意度对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有较大影响，对劳动强度越满意，生活满意度越高。

表 4.2 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总体）

进入到方程中的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自由度	显著水平	发生比
劳动强度满意度	1.033	.500	1	.039	2.811
收入水平满意度	2.036	.561	1	.000	7.663
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	-2 对数似然值=116.913 模型预测精度=92.8%				

观测模型整体适配度的检验数据，模型对应变量的预测准确精度达到 92.8%，-2 对数似然值为 116.913，整体回归模型的适配度较好，表明该模型的效果较为理想。

(2) 女性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表 4.3 是对 179 位女性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汇总，我们发现人口因素和工作因素对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影响十分有限。只有家庭地位满意度这一个自变量最终进入到回归方程，表明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是家庭地位满意度。

根据下表可知，家庭地位满意度这一自变量的优势比为 4.745，即对家庭地位满意度较高的女性流动人口选择生活满意的可能性是对家庭地位满意度较低的女性流动人口的 4.745 倍，表明家庭地位满意度越高，生活满意度就越高，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表 4.3 女性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

方程中的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自由度	显著水平	发生比
家庭地位满意度	1.557	0.747	1	0.037	4.745
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	-2对数似然值=25.569 模型预测精度=95.8%				

观测模型整体适配度的检验数据，模型对应变量的预测准确精度达到 95.8%，-2 对数似然值为 25.569，整体回归模型的适配度较好，表明该模型的效果较为理想。

(3) 男性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表 4.4 是单独对 230 名男性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进行 Logistic 回归的结果，最后进入方程的只有收入水平满意度这一个自变量。可见人口因素和工作因素等变量对男性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十分有限。

通过观察回归方程中自变量的优势比，收入水平满意度的优势比为 1.714，表示对收入水平感到满意的男性流动人口选择生活满意的可能性是对收入水平不满意的男性流动人口的 1.714 倍，即收入水平满意度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

表 4.4 男性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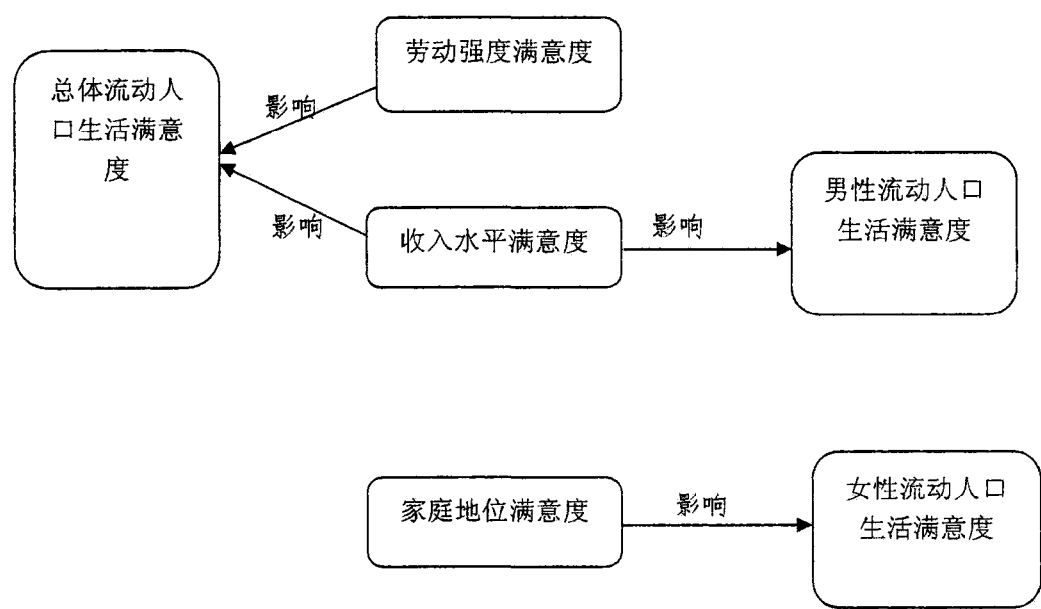
方程中的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自由度	显著水平	发生比
收入水平满意度	0.539	0.476	1	0.257	1.714
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	-2对数似然值=85.859 模型预测精度=90.3%				

观测模型整体适配度的检验数据，模型对应变量的预测准确精度达到 90.3%，-2 对数似然值为 85.859，整体回归模型的适配度较好，表明该模型的效果较为理想。

4.2.3 比较分析

通过上一小节当中总体流动人口的回归模型，和分性别对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可看出男女两性的差异。影响总体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有两项：收入水平满意度（经济因素）和劳动强度满意度（工作因素）。而影响男性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只有 1 个：收入水平满意度（经济因素）。与总体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具有共同点：都包括了收入水平满意度这一自变量。进入女性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方程的只有一个变量：家庭地位满意度（人口因素）。可以看出男性与女性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根据两种不同的回归结果，从本质上看，可以将这种差异性归纳为男性流动人口更注重物质，而女性流动人口则更注重精神。

根据回归结果，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构图如下：



可见，两次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只有一个：收入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收入水平是影响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经济基础，收入水平决定了流动人口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质量水平，也印证了人口迁移的推拉原理：即人口流动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生活、工作、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的条件。

4.2.4 结果解释

(1) 对家庭地位满意度的解释

上述实证研究发现，“家庭地位满意度”在第三个模型中进入回归方程，这表明家庭地位满意度对于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有着重要影响，实际上通过性别与家庭地位满意程度的交叉表可知，男性与女性流动人口对家庭地位的满意程度上有着较大差异性。数据显示男性流动人口对家庭地位的满意度普遍高于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的高低对女性比对男性有着更加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本文分析这与当今主流的男权主导地位有关，在一个家庭中，男性仍然是绝对的一家之主，男性地位也普遍要高于女性。在这种社会现状下，女性对于提升家庭地位的愿望更为强烈，正是由于女性人口对家庭地位的重视，所以，家庭地位满意度顺理成章的成为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故而该变量进入女性流动人口的回归方程。而男性流动人口并不存在对家庭地位的忧虑，所以家庭地位这一指标对男女两性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产生差异。而总体 409 名流动人口中

一男性居多,所以这一自变量也未能进入总体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模型。

(2) 对收入水平满意度的解释

经济因素中只有一个指标进入到最后的回归方程,“收入水平”通过了总体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和男性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的统计性检验。总体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中,收入水平的优势比为 7.663,表明对收入水平满意的流动人口选择生活满意的可能性是对收入不满意人口的 7.663 倍,收入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因为流动人口的流动目的主要以务工经商为主,所以收入水平是流动人口最关心的问题,并且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了流动人口的经济状况的好坏,经济收入过低,流动人口的物质需求难以得到保障,要进一步实现文化需求就更加困难,还使得流动人口对今后的生活和医疗等方面给都产生较深远的消极影响,这些都是对收入水平不满意的流动人口同时也对生活不满意的原因。只有提高收入水平才能满足流动人口的物质文化需求,从而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

(3) 对工作因素各变量的解释

综合三个回归模型的研究结果可知,工作因素对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起到较为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劳动强度满意度这一变量,工作因素的 5 个指标中,只有劳动强度满意度这一个自变量通过模型检验进入回归方程。

劳动强度满意度对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有较大影响,劳动强度满意度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对于这一研究结论的解释,本文将与受教育程度和职位级别结合起来进行解释。根据前文分析可知,仅有 3.7%的流动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高达 85.2%的流动人口属于普通职工,仅有 14.8%的流动人口处于管理层的位子,普遍较低的教育程度决定了流动人口只能从事最为底层的工作,在这种大背景下,意味着流动人口所从事的工作以体力劳动为主,劳动强度普遍较大。过大的劳动强度是对人体身心的摧残,与受过高等教育并且从事脑力或较为轻松的人口相比,低教育程度并从事体力劳动的流动人口对劳动强度的关注程度更深。所以,与工作因素中的其他指标相比,流动人口更关心工作的劳动强度,劳动强度满意度进入回归方程,成为影响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我们发现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稳定性满意度、发展前途满意度和职位级别

对流动人口的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十分有限。因为流动人口对于工作的关注点最终落脚在劳动强度上,无论工作环境好坏,或发展前途如何,最终都归结到工作的劳动强度上去。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其本身就属于流动状态,不具备稳定性,所以这部分人群更加不会对工作的稳定性有过高要求,符合流动人口的特征,从而工作稳定性满意度也不会对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4.3 本章小结

第三章是通过双变量交叉分析各变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描述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本章则是运用了描述性分析和二元 Logistic 回归这两种统计分析手段,一是介绍了二元 Logistic 回归这一计量模型,二是为了重点研究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与 7 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

在对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因素分析的回归模型中,本章通过分别分析总体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和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建立了三个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得出影响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有 3 个:收入水平、劳动强度满意度和家庭地位满意度。并将得出的结论进行两性比较,男性和总体比较,以及女性和总体比较,分析其中的差异性和同质性,并对回归结果进行解释。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理论模型进行了检验,得出的结论与理论基本一致。

依据本章的分析结论,下一章将提出提高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政策和建议。

5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5.1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5.1.1 流动人口的基本特点

(1) 流动人口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整体上不高, 并且体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 女性高于男性。

(2) 流动人口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并且男性文化水平相对高于女性, 整体以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为主。

(3) 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为主, 并且人口年龄趋向年轻化;

(4) 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以有配偶者居多。

(5) 享受社会养老保障的人数占比偏低, 还不足半数, 社会医疗保障的覆盖率较高, 但是与生活满意度相关性不显著。

(6) 健康状况普遍较好。

(7) 对自己的收入水平选择满意的人数占比偏低。

(8) 流动人口对自己的工作除发展前途外的各方面条件较为满意, 职位级别中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属于普通职工, 管理层级别的流动人口极少。

5.1.2 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通过卡方检验的有 7 个指标: 家庭地位满意度、收入水平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劳动强度满意度、工作稳定性满意度、发展前途满意度和职位级别, 这七个指标均与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具有相关性。

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得出的结论。总体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个: 收入水平满意度和劳动强度满意度。影响男性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有一项: 收入水平满意度; 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只有家庭地位满意度这一项。

经过实证研究发现, 收入水平满意度、劳动强度满意度和家庭地位满意度均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 即对收入水平越满意, 选择生活满意的可能

性越大。对劳动强度满意度越高,选择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越大;女性流动人口对家庭地位满意度越高,其选择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越大。

5.2 政策与建议

我国不仅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是一个流动人口大国,并且流动人口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截至2012年底,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2.36亿人,占总人口的17.43%,可见流动人口规模之大。所以如何对这部分人群进行更好的管理,给流动人口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显得格外重要,这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特别是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关心和保障,因为女性在当今社会中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对女性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就显得格外重要。

(1) 切实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受我国五千年的封建文化影响,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导致我们的社会普遍缺乏对女性的尊重意识。要提高女性在家庭中地位,首先要建立对女性的尊重,女性先要学会自我尊重,培养女性的自信,男性对女性的传统观念也需要转变。培养尊重女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树立尊重女性的社会公德,提倡在家庭中男性对女性的关爱和尊重。女性也要学会提升自我修养,承担起抚育子女、照顾家庭的指责。不断学习和接受新事物,调整心态,把握方向,提高自己的独立性,尤其是经济独立,提高应变能力,这才是女性的真正出路,只有得到家庭的尊重,才有助于提高女性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对待流动女性则更加需要贴心的照顾和尊重。

(2) 减轻男性的社会压力和负担。上面分析到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虽然提高了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但这种思想就像一把双刃剑,有利亦有弊。男性地位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责任和负担,形成了巨大压力。首先要切实宣扬和实践男女平等的观念,这也是一种双赢,因为只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一方面女性地位可以得到提高,女性实现经济独立,另一方面,女性的独立也可以为男性减轻经济压力和养家糊口的重任。同时男性自身也要转变传统观念,要切实改变“自己是个强者,不能比女人弱”的老一代观念。其次,整个社会也需要变得更加宽容,对男性人口要平等看待,不应施以超负荷的期望和压力。

(3) 提高全民的教育程度,加强职业教育。教育是中华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所以提升全民族的教育程度,对于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首先应该增强对国民的科普教育普及宣传,最基础的是普及义务教育,基础教育是适应当今社会生活的必要知识储备。另一方面要搞好职业教育,加大技能人才的培养,积极吸取先进国家的经验。借鉴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美国和英国的职业教育经验是:以立法来促进和指导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市场需要为导向,选择专业方向和培养目标,注重学校和企业间的密切合作,贴近市场,实现优势互补;国家和地方财政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力度,职业教育具有较强的职业性、实用性和实践性,其培养目标是为社会培养熟练的技术蓝领人才,非常符合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方向。

我国的流动人口大多数来自农村,或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他们流入城市所从事的工作也都是最基层的社会服务工作,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大,所以作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我们理应对这类人群给予应有的回报。要有效地提高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要做到特殊人群区别对待,例如对女性流动人口,要着眼于如何提高女性的家庭地位,关注女性流动人口工作的单位类型,提高其工作的稳定性,另外保护其婚姻;而对待男性流动人口,则要加强这类人群的职业教育,完善技能培训机制,提高职业发展前景等。只有像这样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更加有效的提高总体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

5.3 本文的不足之处及今后的研究展望

5.3.1 本文研究的缺憾和不足之处

在对本文的课题进行研究和论文的撰写过程中,笔者发现了有以下缺憾和不足:

(1) 数据资源的缺憾

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第二个是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浙江省数据。受数据限制,本文只以浙江省作为研究案例,但涉及到浙江省的样本数不够充足,同时由于借用现成数据,在分析指标选取上受到既定调查问卷的一定限制,由此研究结果可能与现实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浙江省对于流动人口,特别是流动人口两性比较的

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属空白,使得本文的研究没有前人的研究结果作为参考,所以难以对本文的研究结果进行评判和考察。

(2) 分析上的不足

本文对于回归模型的结论的分析还不够到位。例如女性流动人口的回归模型中都剔除了经济因素变量,而这与国内外研究的结论是相悖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至国家都服从这个规律,下到个体身上,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却在这两个回归模型中消失了,但这并不代表这些经济变量的作用并不重要。只是因为这些变量之间没有体现著明显的差异性,而相对于家庭地位满意度这一显而易见的变量而言,经济因素中相关变量的作用效果被取代,总而统计性意义被大大降低了而已。

鉴于以上的不足,所以本文的研究结果只能一定程度上反映浙江地区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

5.3.2 本文今后的研究展望

在本文的整体研究过程中,我感受到的最大缺憾是未能参与到所用问卷的调研过程中去。出于对本文的改进,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专门针对研究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设计调查问卷,在问卷的设计环节会补充更多有针对性的问题,如:家庭关系、赡养老人情况、居住条件等,这样有利于更加全面了解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并且选取浙江省内的外来女性流动人口,流出省外的女性人口,以及所有流出省外的男性人口,尽可能多的收集样本数据,并尽量选取差异性较明显的受访群体,这样分析的结果才会更具有显著性和代表性。

在数据的处理上,尽量避免太过粗糙和笼统的合并方式,尽量根据每个自变量的属性(连续变量或离散变量,多分类有序变量或多分类无序变量),采取不同的回归方法。另外,怎样避免各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设置哑变量),这也是我们今后研究过程中需要克服的难题。对于多分类的被解释变量,可以探索如何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对于问卷中的缺失选项和类似于“说不清”这种答案将不纳入分析过程,这样可以排除研究者的主观干预,以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

参考文献

- [1] 李品品. 农村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明光市为例[D].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08.
- [2] 龙文进. 北京市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基于抽样加权数据的有序 Probit 模型分析[D]. 中国人民大学, 2009.
- [3] 陈丽娜, 张建新. 大学生一般生活满意度及其与自尊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4, 18(4): 222-224.
- [4] 严标宾, 郑雪, 邱林等.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3, (2): 137-142.
- [5] 柳迎新, 黄文倩, 朱婉儿等. 大学新生的自杀意念及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2, 26(3): 235-238.
- [6] 彭中, 魏咏兰, 王琼等. 成都市不同职业流动人口健康高危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现代预防医学, 2012, 39(3): 631-633, 636.
- [7] 孙莹, 陶芳标. 中学生学校生活满意度与自尊、应对方式的相关性[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5, 19(11): 741-744.
- [8] 孟秀红, 陶芳标, 黄朝辉等. 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在中国青少年中的应用[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0, 24(8): 613-618.
- [9] 张金凤, 赵品良, 史占彪等. 玉树地震后幸存者的创伤后应激症状、生活满意度与积极情感/消极情感[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2, 26(4): 247-251.
- [10] 赵思萌, 王晓玲, 陆爱桃等. 社会支持在情侣依恋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1, 25(8): 625-629.
- [11] 李丹, 李玉凤.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22(7): 151-155.
- [12] 李德明, 陈天勇, 吴振云等. 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8, 22(7): 543-546, 549.
- [13] 徐维国, 骆斌, 李军等. 西安市雁塔区 1500 例流动人口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调查报告[J]. 中国临床研究, 2012, 25(3): 309-310.

- [14] 田丽丽,刘旺.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中文版的初步测试报告[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19(5):301-303.
- [15] 胡发稳,李丽菊.哈尼族中学生文化适应及与学校生活满意度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0,24(2):144-148.
- [16] 张兴贵,何立国,郑雪等.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的结构和量表编制[J].心理科学,2004,27(5):1257-1260.
- [17] 李德明,陈天勇,李贵芸等.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研究[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3,23(7):405-407.
- [18] 田丽丽,郑雪.中学生五种人格因素与多维生活满意度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21(3):165-168.
- [19] 阮玲玲.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区迁入人口及其对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影响研究[D].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2008.
- [20] 侯娟,邹泓,李晓巍等.流动儿童家庭环境的特点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9,25(2):78-85.
- [21] 金盛华,田丽丽.中学生价值观、自我概念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3,19(2):57-63.
- [22] 严标宾,郑雪.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大学生生活满意度比较[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21(7):436-439.
- [23] 陈微.青年民工的素质缺项与精神保障[J].当代青年研究,2003,(4):9-16.
- [24] 徐维国,骆斌,李军等.西安市雁塔区1500例流动人口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调查报告[J].中国临床研究,2012,25(3):309-310.
- [25] 张凯,吴守宝,钟建平等.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2,21(4):367-369.
- [26] 李栋,徐涛,王战勇等.济南市部分区县老年人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2):123-124,114.
- [27] 孙配贞,郑雪,余祖伟等.初中生感戴状况与学校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0,26(1):67-72. [28] 王滢雪,黄明雷.晨练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J].中国老年学杂志

志, 2011, 31 (23): 4657-4659.

[29] 丁志宏. 新生代农民工保安的生存状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J]. 兰州学刊, 2010, (5): 62-64, 93.

[30] 郝桂兰, 杨南南, 王爱华等. 养老院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2, 32 (14): 3012-3013.

[31] 陆建兰. 城市空巢老人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2, 32 (11): 2354-2356.

[32] 靳小怡, 郭秋菊, 刘蔚等. 性别失衡下的中国农村养老及其政策启示[J]. 公共管理学报, 2012, 09 (3): 71-81.

[33] 杨永忠, 赖元峰, 梁旦成等. 被忽略的 80%——普通高校师资管理中令人费解的事情[J]. 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3 (2): 178-181.

[34] 刘亚, 王振宏, 马娟等. 大学生外倾性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情绪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 (5): 666-668, 671.

[35] 龚会, 时勘, 卢嘉辉等. 电信服务业员工的情绪劳动与生活满意度——心理解脱的调节作用[J]. 软科学, 2012, 26 (8): 98-103.

[36] 姚本先, 石升起, 方双虎等. 生活满意度研究现状与展望[J]. 学术界, 2011, (8): 218-227.

[37] 吴黄丹如, 贺婕, 王力等. 领悟社会支持、社会评价与震后灾民生活满意度的关系[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12, 21 (4): 355-357.

[38] 伏干. 盐城市城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与社会支持[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1, 31 (16): 3138-3140.

[39] 严丹君, 俞爱月. 老年人焦虑、抑郁和生活满意度及相关性[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1, 31 (10): 1847-1848.

[40] 陈家起, 孙蓬飞, 张欣欣等. 2014 年青奥会对南京市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3, 47 (1): 19-22.

[41] 田丽丽. 维吾尔族中学生多维生活满意度现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7, 21 (7): 443-446.

[42] 刘旺, 田丽丽, Rich Gilman 等. 中美两国中学生生活满意度的跨文化研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5, 19 (5): 319-321.

- [43] 杨美荣,苑杰,高志华等.煤矿伤工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11,14(1):81-84.
- [44] 王晓宇,肖晶,崔丽霞等.大学生爱情观、功能失调性态度与爱情质量及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2,21(6):555-557.
- [45] 胡荣华,陈琰.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研究,2012,29(5):79-83.
- [46] 刘旺.小学生自尊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19(11):745-749.
- [47] 曹大宇.环境质量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1,(21):84-87.
- [48] 曹慧,钱青文,孙莹等.安徽省蚌埠市初中生体力活动现状及其与抑郁症状、学校生活满意度的关联研究[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2,33(2):154-159.
- [49] 徐东,费立鹏,王志青等.有无精神障碍自杀未遂者自杀强度和满意度的比较[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19(9):600-602.
- [50] 楼玮群,桂世勋.上海高龄体弱老人家庭亲属照顾者的生活满意度:照顾资源的作用[J].人口与发展,2012,18(3):74-81.
- [51] 李辉,白新杰.社会认同视角下中国农民生活满意度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调研世界,2010,(7):27-30.
- [52] 于川,孙晓星,马文晴等.封闭式中学与非封闭式中学学生学习生活满意度差异的调查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2011,(9):43-46.
- [53] 冯学兰.回汉移民社区居民家庭生活满意度的代际互惠影响——以N自治区Y市移民家庭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12,(4):86-93.
- [54] 张建英,李义安,等.农村中小学校长人格特征与其自我实现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J].教育探索,2013,(1):133-136.
- [55] 郭大水,梁锦江,肖童等.天津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31(16):3129-3130.
- [56] 吴胜涛,李娟,祝卓宏等.地震遇难者家属的个体韧性及与社会支持、心理健康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0,24(4):309-312,317.
- [57] 严标宾,郑雪.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文化效应检验[J].

心理科学, 2007, 30(6): 1337-1341.

[58] 黄蕊, 刘伟平. 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评价实证研究[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11): 183-186.

[59] 杨秀兰, 郭勇, 赵智等. 在校研究生多维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1, (7): 44-50.

[60] 高婧, 冯辉, 袁群等. 怀旧团体心理干预对社区老年人抑郁症状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1, 31(3): 386-388.

[61] 王鑫强, 张大均. 初中生生活满意度的发展趋势及心理韧性的影响: 2 年追踪研究[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2, 28(1): 91-98.

[62] 田振, 郭伟, 张科学等. 社会转型期农村"空巢"老人生活满意度分析[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0, 30(6): 820-822.

[63] 刘旺, 冯建新. 听障中学生多维生活满意度及其与自我概念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7, 21(2): 101.

[64] 郑立新, 陶广放. 儿童主观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1, 9(2): 105-107.

[65] 桑青松, 葛明贵, 姚琼等. 大学生自我和谐与生活应激、生活满意度的相关[J]. 心理科学, 2007, 30(3): 552-554, 563.

[66] 郭星华, 张晶. "凹陷"的社会生活满意度——基于全国"百村调查"数据的探索研究[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1, (2): 60-65.

[67] 刘永策, 林明鲜. 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9, 29(5): 607-609.

[68] 巩金培, 张琰, 王俊峰等. 县处级干部亚健康与生活满意度、应对方式研究[J]. 现代预防医学, 2012, 39(1): 88-89, 95.

[69] 李德明, 陈天勇, 李海峰等. 中国社区为老服务及其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9, 29(19): 2513-2515.

[70] 高文书, Russell Smyth. 未来收入预期与进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对上海等 12 个城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0, 26(6): 21-33.

[71] 邱林, 郑雪. 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判断的文化差异研究[J]. 心理发展与教

育, 2007, 23 (1): 66-71.

[72] 宋淑娟, 廖运生. 初中留守儿童一般生活满意度及其与家庭因素的关系[J]. 中国特殊教育, 2008, (8): 27-30.

[73] 刘启刚, 李飞.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大学生生活事件和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5 (4): 397-398.

[74] 刘桂阳, 陈长香, 洪慧玲等. 生活满意度对临床护士围绝经期综合征及抑郁症的影响[J]. 现代预防医学, 2012, 39 (15): 3816-3817.

[75] 贾存显, 李士保, 赵腾等. 生活满意度与自杀未遂关系[J]. 中国公共卫生, 2008, 24 (6): 700-702.

[76] 李德明, 陈天勇, 李贵芸等. 北京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6, 14 (1): 58-60.

[77] 吴胜涛, 李娟, 祝卓宏等. 5·12 地震灾区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及其相关因素调查[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9, 29 (11): 1404-1406.

[78] 李晓苗, 张芳芳, 孙昕震等. 我国青少年生活方式、自尊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0, 42 (3): 330-334.

[79] 刘旺, 冯建新, 刘鸣等. 高中教师的工作家庭冲突: 特点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 中国特殊教育, 2010, (3): 77-81.

[80] 高建新, 左冬梅. 儿女教育程度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9, 29 (23): 3092-3095.

[81] 邱成平. 农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对五台县某村的研究报告[J]. 现代预防医学, 2011, 38 (11): 2100-2102.

[82] 郭文斌.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以温州为例[J]. 社会科学家, 2008, (2): 66-68.

[83] 罗亚莉, 刘云波. 大学生专业承诺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8, (1): 134-137.

[84] 黄朝辉, 陶芳标, 郝加虎等. 生活满意度在农村学生住宿类型与孤独感中调节/中介效应的分析[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9, 30 (3): 222-226.

[85] 方纲, 风笑天. 城乡居民主观幸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成都市为例[J]. 人口与发展, 2009, 15 (6): 74-81.

- [86] 李享, 宁泽群, 马惠娣等. 北京城市空巢老人休闲生活满意度研究——以北京市三大典型社区为例[J]. 旅游学刊, 2010, 25(4): 76-83.
- [87] 田丽丽, 刘旺, Rich Gilman 等. 国外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研究概况[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3, 17(12): 814-816.
- [88] 汪作为, 方芳, 陈银娣等. 认知行为干预对抑郁症患者家属述情障碍应对方式、生活满意度及心理健康的影响[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09, 18(9): 799-801.
- [89] 陈世平, 乐国安. 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心理科学, 2001, 24(6): 664-666.
- [90] 彭代彦, 吴宝新. 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与农民的生活满意度[J]. 世界经济, 2008, (4): 79-85.
- [91] 孙鹃娟. 北京市老年人精神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8, 28(3): 308-310.
- [92] 陶芳标, 孙莹, 凤尔翠等. 青少年学校生活满意度评定问卷的设计与信度、效度评价[J]. 中国学校卫生, 2005, 26(12): 987-989.
- [93] 周明洁, 张建新. 不同时期中国人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水平的比较[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5(5): 499-501.
- [94] 冯晓黎, 李兆良, 高燕等. 经济收入及婚姻家庭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J]. 中国公共卫生, 2005, 21(12): 1426-1427.
- [95] 林林, 郭建国, 相静等. 山东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生活满意度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 2012, 39(14): 3545-3549.
- [96] 刘裕, 贾志永. 大学生学校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08, (1): 56-60.
- [97] 刘剑虹, 贺豪振, 单文萍等. 民营企业子女的领导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调查[J]. 浙江社会科学, 2011, 32(12): 141-148.
- [98] 黎建斌, 聂衍刚, 司徒巧敏等. 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水平和稳定性的作用[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2, 10(5): 389-394.
- [99] 杨海荣, 石国兴, 崔春华等. 初中生应对方式与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5, 14(2): 116-117.

- [100] 刘旺, 冯建新. 初中生学校适应及其与一般生活满意度的关系[J]. 中国特殊教育, 2006, (6): 77-81.
- [101] 池瑾, 胡心怡, 申继亮等. 家庭背景与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的关系[J]. 心理研究, 2008, 01(2): 57-61.
- [102] 马会军. 民族地区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生存状况的实证分析——以西宁市为例[J]. 青海民族研究, 2011, 22(3): 42-48.
- [103] 吕斐宜.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调查[J]. 统计与决策, 2006, (17): 81-82.
- [104] 王薇, 罗静, 王毅等. 流动儿童家庭因素、社会支持与情绪的关系[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10, 19(6): 556-557.
- [105] 徐凤娇, 邓瑞姣. 长沙市流动儿童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11, 32(5): 544-546.
- [106] Recovery of life satisfaction in person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during inpatient rehabilit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2009, 88(11): 887-895.
- [107] Easterlin, R.A., Morgan, R., Switek, M. et al.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2, 109(25): 9775-9780.
- [108] Pierce, CA, Hanks, RA. Life satisfaction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odel of disability.[J].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2006, 85(11): 889-898.
- [109] Baumann, M., Lurbe, K., Leandro, M.-E. et al. Life satisfaction of two-year post-stroke survivors: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motor impairment, Newcastle Stroke-Specific Quality of Life Measure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 - Bref of informal caregivers in Luxembourg and a rural area in Portugal[J].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2012, 33(3): 219-230.
- [110] Kim, S.-Y., Sok, S.R..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perceived health status, family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older Korean adul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practice, 2012, 18(4): 325-331.

[111] Besier,T,Schmitz,TG,Goldbeck,L et al.Life satisfaction of adolescents and adults with cystic fibrosis: impact of partnership and gender.[J].Journal of Cystic Fibrosis,2009,8(2):104-109.

[112] VanLeeuwen,C.M.,Post,M.W.,Westers,P. et al.Relationships between activities, participation, personal factors, mental health,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person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J].Archives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2012,93(1):82-89.

[113] Klemm,K.C.,Magann,B.E.F.,Morrison,J.C.et al.Life satisfaction and obstetric out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J].Southern Medical Journal,2012,105(5):279-282.